中共五大会址位于武昌都府堤街20号，原为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更名为国立武昌第一小学。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纪委的前身在此诞生。1956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陈邂鑿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陆建军　陈立新　郑学军
姚四平　曾艳红　谢受贵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　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　濛
编　　辑：严　濂　郑雅飞
特约编辑：华　蕾　张川蕾
游　迎
封面设计：王　鹏

目 录

红色印记

4　中共五大基本陈列改陈提升亲历记 / 万　玲

文化传承

8　尘封档案再现拉戏的百年流变 / 顾丽敏

商聚汉皋

11　有种力量叫“湖北浙商” / 何明东（口述）　许　濛（整理）
16　“三硬商人”的桑梓情 / 李万军（口述）　严　濂（整理）

精工匠心

21　我是“玩泥巴”的勘察人 / 徐　凡（口述）　白爱萍（整理）

委员天地

25　厚植为民情怀，牢记医者本心
/ 侯立新（口述）　郑雅飞（整理）
29　一位老台盟人的对台工作感悟
/ 吴晖（口述）　唐红漫（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1 年第 12 期（总第 350 期）

往事漫忆

33　湖北联中校友万庚育的敦煌情 / 王　立
39　武汉长江二桥工地采访手记 / 尹新秋

史海钩沉

43　“新升隆”轮事件中遇难的五位湖北籍烈士 / 王文宾

楚风汉韵

47　摩崖石刻见证武汉古代厚重历史 / 万建辉　宋　贝　张　剑

都市史话

56　湖北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的来龙去脉 / 张慧琴

目录索引

60　本刊 2021 年总目录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szl@163.com

中共五大基本陈列改陈提升亲历记

◇万 玲

2021年6月,《紧急时期的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隆重开展。展览创新设计理念，打造陈列精品，深入解读了革命文献和史料，挖掘文物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和细节。改陈提升后的展览，入选中宣部、国家文物局联合推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览。

此次展览筹备已久，从展陈大纲编写到最终呈现历时两年。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我亲历了陈列改陈提升全过程。回首那段难忘的日子，更加坚定了我作为红色场馆文博人的使命感，及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的责任感。

筹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展览开展

2006年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受主任李景田委托，到武汉实地考察中共五大会址，向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提出加强保护的建议，并介绍了广东三大会址保护的情况和经验。10月，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李景田向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提出关于保护、利用中共五大会址的建议。

俞正声一回武汉，立即就五大会址修复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武汉市委、市政府迅速行动，李宪生市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对五大会址纪念馆及会址所在地的都府堤街周边环境综合整治作出统一部署。12月，市发改委组织五大会址建馆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论证会，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姚金果、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保国及省市党史、文博、历史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参加会议。

2007年1月，市发改委发文《关于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工程立项的批复》，对会址纪念馆建馆工程立项。4月2日，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张树军、黄如军、彭红等10位专家对展览方案进行

论证。3 日，国家文物局组织夏燕月、沈庆林等 7 位专家对方案进行论证。4 日，国家博物馆组织夏传鑫、方孔木、李俊臣等 5 位专家对方案进行论证。6 月 12 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方案和《中共五大会场复原陈列》方案并批复同意按方案布展。2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复函同意筹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

紧急时期的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

2007 年 11 月 30 日，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建成开馆。馆内按原貌修复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风雨操场、小礼堂和教工宿舍，复原中共五大开幕式会场，陈潭秋、徐全直夫妇卧室，武昌第一小学教室和传达室，以及布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陈潭秋早期革命活动陈列》等基本陈列。

发掘新史料新成果，谋划改陈

会址修复和纪念馆的落成，为中共五大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2017 年 12 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冯俊在“聚焦 1927：中共中央在武汉暨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 9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中共五大在党的建设上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和新的突破。2021 年 2 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也对五大在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意义作了论述。

比如，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一大批拥有坚定信仰和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首次当选中央委员，进入了中央领导机关；大会第一次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部的指导原则写入党章；第一次设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使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称；第一次规定党的各地方组织为省委、市委、县委和区委；第一次规定党团（即党组）的设置与职责；第一次用专章规定党和共青团的关系；大力加强党的支部建设，奠定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

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对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的章程、强化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的高度重视。在大会委托中央政治局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特别单独增加了“监察委员会”一章。党章还重新修订了党的纪律条款，对违反党纪的党员和党组织，分别规定了不同程度的处分方式。

五大闭幕后，湖北、四川、满洲等地党组织相继成立省监察委员会或增选了省委监察委员，在不同程度上履行了党章赋予的职责。中共中央在武汉期间，非常重视利

用党校对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两湖党校、江浙区委党校等在教育培训党员干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共五大历史文献资料的征集。2016 年，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一道远赴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征集档案资料，征集到中共五大开幕及会场等珍贵历史照片，填补了国内早期党代会历史照片的空白，是我国党史研究领域一个重大突破。

然而，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五大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相继发现和征集到众多的珍贵史料和文物，原有五大会址历史陈列展厅面积较小，无法满足全面展示五大历史的需要。因此，武汉革命博物馆从 2019 年 6 月开始启动五大会址历史陈列改造提升工作。

提炼主题谋篇布局，完善方案

好的展览，要有一个能准确诠释主题的展标。因此，改陈提升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新的研究成果中提炼主题，确定展标。2019 年 7 月，武汉革命博物馆组织曾成贵、方城、陈芳国、周斌、向元芬、孟婵六位党史、文博专家，在五大会址会议室召开改陈提升第一次专家咨询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改陈提升要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及馆藏文物资料，充实展览内容，并充分认可高万娥馆长提出的“紧急时期的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这一展览主题。

12 月，武汉革博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专家李颖、卢洁、杨凯等，在北京召开中共五大基本陈列改陈提升方案专家论证会。专家们提出如下建议：站在新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提炼主题；方案的逻辑结构需进一步调整；展览的特色和重点要更加突出；方案引用的资料要更具权威性；方案的文字要更加精炼、准确，等等。

2020 年 10 月，博物馆组织曾成贵、陈芳国、周斌、王守宪等省市党史、文博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们对方案内容做了部分调整。原展览的三个部分“高潮与危机”“贡献与局限”“应变与转折”，调整为四个部分“中共五大的历史背景”“中共五大的筹备召开”“中共五大的贡献与局限”“中共五大后的探索与奋斗”。这使得展览流线更加顺畅，故事性增强。

这年 8 月，我们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提请审定提升改造方案。省委宣传部原则上同意提升改造，并要求进一步修订完善布展大纲和版式稿后报审。2021 年 2 月，省委宣传部审定通过改陈布展方案。随后，我们启动招投标程序，确定展陈公司，深化设计，进场施工布展。

创新设计以物述史，打造精品

2021 年 4 月，中共五大基本陈列入选中宣部、国家文物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精品展览推介名单。湖北省仅 2 个展览入选。这对于我们改陈提升既是动力，更是压力。我们必须在现有国保建筑的框架下，创新设计理念，打造展览精品。

4 月 27 日，武汉革博组织省市党史、文博专家，召开五大历史陈列改陈深化设计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对序厅元素、场景、多媒体、标题版式等具体表现形式提出修改建议。从 4 月份进场施工到 6 月 16 日开展，施工周期短、任务重，团队成员加班加点，精打细磨，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

与此同时，我们秉承“以物述史”理念，展示见证五大历史的珍贵史料和文物，更好

地丰富展览细节。此次改陈后的展览共展出历史图片 300 余幅，上展文物资料 180 余件 / 套，其中珍贵文物 29 件。在“中共五大的筹备与召开”这一部分，补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记录”等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相关文献史料，同时，把从俄罗斯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档案馆征集回来的珍贵档案文献资料以辅助展项单独展示，详细呈现会议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全过程。

8 月 25 日，武汉革博组织省市党史、文博专家召开五大历史陈列展览项目竣工验收会。与会专家现场参观展览，认为该项目达到了改陈提升的预期目标，兼具学术性、艺术性、思想性及功能性，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改陈升级全新亮相，赢得好评

2021 年 6 月 16 日，《紧急时期的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隆重开展。展览主题突出，导向鲜明，将五大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放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全面准确的阐释。

展览在原中共五大会址 5 号楼的基础上，增加了 3 号楼的 2 层，展示面积从 660 平方米增加到 1100 平方米。展出历史图片 300 余幅，上展文物资料 180 余件 / 套，其中珍贵文物 29 件。展览设置辅助展项 18 处，运用新科技、新材料、新工艺，包括浮雕、圆雕、硅胶塑像、立体半景画、油画、造型墙等艺术创作，以及全息投影、多层次景箱、多点触摸屏、多媒体艺术空间、多媒体文字沙盘等展示手段，配以背景音效、灯光效果等，将宏大叙事与细节呈现有机结合，多维度全景式呈现中共五大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序厅浅浮雕刻画了中共五大代表走出五大开幕式会场的群体形象。中间的圆雕塑造了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任弼时五位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他们身后的一道门廊，既是五大开幕式会场的元素，也象征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时期。这样一群人，仿佛正从历史深处走来，带领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此外，还有五大会场、五大代表艺术空间的设置，等等。

全息投影技术的运用是此次展览的最大亮点。中共五大是一次民主氛围非常浓厚的会议，大会代表在会场就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策展人员根据诸多回忆材料和党史研究成果，设计了大会讨论全息投影视频拍摄的脚本，采用全息投影形式呈现大会的民主氛围。尾厅设计“征程”这一视频片，让观众感受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历程，警醒人们从历史中汲取不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展览一经亮相，立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开展首日接待观众超过 2 万人次，各大权威媒体报道 30 余次。现已接待全国各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近 70 万人次，成为党员干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阵地。

与时代同频共振，以精品奉献人民。改造提升后的中共五大会址历史陈列展览，对加强革命文物的保护修复和展示传播，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掘和利用创新，提升革命文物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教育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在新征程上砥砺奋进。

（万玲：武汉革命博物馆副馆长）

尘封档案再现拉戏的百年流变

◇ 顾丽敏

我是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单弦拉戏的传承人。我爷爷顾耀宗，生前是武汉市入选省级非遗项目单弦拉戏的代表性传承人，他曾在82岁高龄之年，前往上海、苏州两市档案馆，查阅百年来有关拉戏的历史档案，带回了数十份影印资料。我从这些尘封的档案中，看到了拉戏这门民间艺术百年来流传演变的历史轨迹。

惟妙惟肖的三弦弹戏

1912年10月17日，上海《申报》载:“群仙茶园，王玉峰，二七夜戏，文昭关、太师回朝，军乐。”下有启事一则:“王玉峰回京，以各界欢迎挽留数日，自礼拜一夜起至礼拜五夜止，仍在群仙茶园弹演，乐乐轩启。”第二天又登了王的启事：“玉峰生性疏懒，惮于奔波，再复南来，颇非易事……于月之八夜迄十一夜止，仍在群仙茶园弹演四天，竭生平之技，藉报知己之情……”

这是一则百年前三弦弹戏在上海群仙茶园的演出广告。三弦弹戏是清朝末年出现在我国北方的一种用三弦弹奏模仿戏曲唱腔的民间艺术形式。王玉峰1872年出生于北京，汉军正黄旗人，13岁学艺，擅长演奏二胡、三弦、弹唱小曲等，后来倾注全部精力首创用三弦模仿京剧唱腔、军乐演奏，技艺精湛，从北京、天津辗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演出，深受欢迎。从当年《申报》所载内容可以看到：王玉峰演出唱段有《文昭关》《太师回朝》《捉放曹》《空城计》《宇宙锋》《二度梅》等，还有军歌、军乐、军操等内容，这是他回京前的一次告别演出。他在《申报》刊登的告别启事中写道：“竭生平之技，藉报知己之情”，“再复南来，颇非易事”。

然而他回京后就一病不起，离沪后第二年（1913年）就去世了，终年41岁。这次告别演出成了他的最后一次演出，也成了他在上海的绝唱。王玉峰生前虽未收徒传艺，但他的三弦弹戏，对以后的三弦拉戏、单弦拉戏等民间艺术的形成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脱颖而出的三弦拉戏

王玉峰离开了上海，但三弦弹戏留了下来，后起的新秀们奏出了属于自己的声

音。1917 年 10 月 21 日上海《申报》载：“邑庙豫园劝业场四楼，邱聘卿三弦拉戏，五点半起五点五十分止，十点三刻起十一点止。”3 年后，1920 年 9 月 22 日《申报》载：“上海新世界，邱聘卿三弦拉戏，沈易书南方拉戏。”

当年，对于三弦拉戏这一新的演奏形式，社会反响如何？我们可以从 1924 年 7 月 4 日《申报》刊登的一篇《三弦拉戏小评》中窥得端倪。文中写道：

“三弦拉戏已为近日游戏场中主要游艺之一，当十余年前，有王玉峰者，双目失明，善弹三弦……邱聘卿从而习之……无意中将胡琴之弓，移扣三弦上，随意奏弄，觉其发音洪亮、逼肖喉唱，于是悉心练习，数月后居然成功。社会喜其新颖别致，故每一奏技，听者拥挤。为时以三弦拉戏为业者，仅邱一人，故数年间声誉遍南北焉。后有沈易书者，本业星命，于操业之暇，悉心仿习。不久，尽得个中三昧……艺成后应新世界之聘，竟然与邱相角逐，一般游客本其喜新厌旧之性，多舍邱而就沈，沈恐贻拾人牙慧之讥，遂另雇一人专操京胡，而己则仅拉唱句，易其名曰南方拉戏……近年继邱沈而起者，若电光拉戏，若空中拉戏，若单弦拉戏等，虽名目不同，而其实皆换汤不换药也。”

这篇90多年前的评论文章，清晰地勾画了从三弦弹戏到三弦拉戏、单弦拉戏的传承发展的演变过程。十余年前，王玉峰虽双目失明，但其演奏的三弦弹戏令听者赞叹不绝，也使得这一民间艺术广为流传。三弦弹戏得到邱聘卿、沈易书等人的创新性发展，成为三弦拉戏。这一技艺逐步走向精湛，民间艺人们创造了电光拉戏、空中拉戏、单弦拉戏等新形式，为人们呈现出多样化的更为丰富的视听盛宴。

我们还可以在 1952 年上海市戏曲班社概况调查表中看到，沈易书后来并没有沿用南方拉戏的名称，用的是沈易书三弦拉戏团这一名称，演出地点在大世界游乐场，总人数 5 人（主演 1 人，伴奏 4 人），在最受欢迎的节目一栏中，填的是“仿京剧等地方戏曲拉奏及各种鸣叫声”。说明这种三弦拉戏形式直到建国后，在上海大世界等多个游乐场中都有演出人员，并且演出规模已从个人扩大成团体，增加了伴奏乐队，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与此同时，在南京、苏杭等地的游乐场中，拉戏艺术的演员和观众的队伍，也在不断成长扩大。

争奇斗艳的单弦拉戏

从 1930 年前后的苏州报刊中可以看到，当时在苏州各游艺场中表演三弦拉戏的有沈易书、赛凤林、李传芳、朱谓侬、顾伯年等多人，而顾伯年的拉戏形式格外别出心裁、

顾耀宗（左一）和孙女顾丽敏（左二）参加武汉市文化局工会举办的演出

引人注目。1928年8月19日《苏州明报》载：“苏州游艺园，顾伯年、李传芳，三弦拉戏、空中拉戏”。1929年8月2日《吴县明报》载：“遂园小世界。顾伯年铜台电灯拉戏。”“永安乐园特聘顾伯年先生、王爱芳女士老牌拉戏加演真假对唱京调小曲”。

1933年12月27日《苏州明报》载：“百子游艺园顾伯年先生，首创老牌空中拉戏，灯彩与众不同。”另载：“顾伯龄、顾慧君，场面拉戏，经济堂会……”所谓铜台灯彩空中拉戏，即在一个铜制的长方形小台上搭一个框架，中间从上至下置一根琴弦，演员在这根琴弦上拉奏，配以铜质喇叭扩音，加上各色彩灯烘托，基本的演奏技巧是单弦拉戏。

1949年至1951年，顾伯年正在上海大新公司游乐场表演单弦拉戏。武汉民众乐园的干部许良到上海招聘演员，经商洽，顾伯年全家迁到武汉，从此单弦拉戏扎根汉口、花开江城。20世纪50年代汉口民众乐园二楼曲艺剧场里，当顾伯年演奏、儿子顾耀宗伴奏的单弦拉戏演出时，台下观众座无虚席、掌声不断，一曲奏罢总是要求再来一段。

1953年5月，顾氏父子曾随武汉慰问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尽管出发前已经做过专门的心理学培训，但真正跨过鸭绿江，看到眼前“都被炸平了，老百姓都没有了”，演员们还是惊呆了。第二天抵达目的地，在为志愿军烈士扫墓时，当时19岁的顾耀宗再也忍不住了，扑倒在坟墓上，痛哭起来。演员们主动申请：“让我们尽量多做一些慰问演出，人再少也演。”

在朝鲜前线的3个月里，慰问团在简陋的舞台上演出，在大炮旁演出。一天演完两场后，顾伯年、顾耀宗父子俩还去炊事房为战士们加演。回国时，顾耀宗带回了志愿军指战员的签名、朝鲜的树叶，也带回了前线战士们的珍贵照片。

20世纪60年代，武汉曲艺队赴广州演出时，倾倒羊城，轰动香港。1961年11月22日香港《文汇报》载：“在绿色帷幕里，走出一位年近半百的老人，手持一把只有一根弦的怪琴，有些观众暂时还没有理解其中的奥妙。但是，顾伯年左手的一个食指触到唯一的一根琴弦的时候，奇妙的音响效果产生了，人们听到的不是琴的声音，而是人的声音。一点不错，一根琴弦发出了人声，一会是苍劲深沉的生角在唱，一会又是清脆柔润的旦角道白和唱腔。阖目静听，宛如一台好戏，一曲终止，掌声四起。”单弦拉戏在广州演出时，不但受到粤港观众的热情欢迎，还受到当地文艺界同行的高度重视，广东音乐曲艺团著名高胡演奏家刘天一先生，曾多次和顾氏父子会晤，互相交流技艺。

顾氏家门从事这门艺术的除顾伯年外，还有他的胞弟顾伯龄、侄女顾慧君、儿子顾耀宗、重孙女顾丽敏等四代五人之多，称得上“拉戏世家”。1976年3月23日，顾伯龄在寄给侄儿顾耀宗的信中写道：“我知道前辈老艺人邱聘卿、沈易书这二位老人都是三弦拉戏。单弦拉戏你父亲可以算是发明人了，你说对吗？你父亲首先也是三弦拉戏，后来空中拉戏，最后是单弦拉戏，所以说你爸爸是发明人了。”

从1912年前的王玉峰的三弦弹戏，到20世纪30年代的三弦拉戏，再到如今的单弦拉戏，拉戏艺术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上海、苏州档案馆的这批宝贵的尘封档案，印证了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的历史轨迹。悠扬的琴声在历史长河中流淌，尘封的档案是永远的见证。

（顾丽敏：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单弦拉戏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有种力量叫“湖北浙商”

◇ 何明东（口述） 许 濛（整理）

人物名片：何明东，浙商总会副会长兼湖北商会会长，武汉锦绣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政协湖北省第十一、十二届委员，政协武汉市第十二届委员，湖北省工商联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组织总会副会长，湖北省委政法委法制环境监督员，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

在北纬30度线附近，既有地表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有海底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埃及的尼罗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以及中国的长江，也均在这一纬度线入海。这里既有许多奇妙的自然景观，又存在着许多令人难解的神秘现象，这是一条神秘而又奇特的纬线。

在这条纬线上，纵横近千里的湖北和浙江两个神奇坐标实现了对接，而催生这种现象的一股重要力量就是“湖北浙商”。人的流动，让这两个地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既要风口逐风，又要潮头搏浪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长篇报道《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这篇报道中首次概括了著名的“四千精神”——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

“四千”精神也镌刻了我的人生。

1986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在改革开放的驱动下，老家浙江湖州当时已形成较为发达的服装产业。我也加入了经商大潮，从棉布经销和服装贸易切入，闯上海，入东北，开启了自己的从商之路。

1990年，我创办印染厂并成立第一家公司，经营规模做到2000多万元，员工100多人，主要从事来料加工的印染业务。随着时间的累积，我将触角伸向了房地产等业务，事业版图逐渐做大。

浙商每天可以不看财务报表，但必看

新闻联播。在浙商的经商法则里，坚持看新闻联播高居首位，关注时政大局、把握经济命脉写进了浙商的 DNA。

2005 年，中央明确提出中部崛起发展战略，加大对中部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从这条信息中，我嗅到了巨大的商机。彼时，已经积累一定资金的我，毅然来到武汉，开始了长达 16 年的深耕细作。

2006 年，我投入 1.5 亿元收购武汉长江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随即投资近 5000 万元对长江大酒店进行装修改造，并放权给专业团队管理，使长江大酒店焕发出新的生机。为了进一步打造和挖掘“长酒”品牌，2008 年我又投资近 1.8 亿元，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沌口长江大酒店。该酒店按国际四星级标准投资兴建，填补了开发区内无高档酒店的空白。

闻风而动，借风而行，我的投资在武汉逐步增长。目前，武汉锦绣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我带领下已发展成为集绿色能源、地产开发、酒店管理、大健康产业等多元化产业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直接或间接控股公司近 30 家，提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年利税约 2.3 亿元。

我的经历只是在鄂浙商的一个缩影，相较于名下的企业，更让我自豪的是“何会长”这一身份。

湖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总商会）成立于 2004 年 5 月，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授牌成立。习近平同志当时寄语湖北浙商“以诚信为本，以商会为家，以情谊为重，以奉献为荣”。

2011 年 12 月 25 日，商会成功召开三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我有幸高票当选第三届理事会会长。2017 年 1 月 12 日，商会召开四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荣获全票通过，成功连任第四届理事会会长。这个会长一当就是十年。

既要抱团成势，也要发展做强

新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第一个私营经济试验区、第一张股份合作制企业营业执照，都来自浙江。秉持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浙商精神，湖北省浙江商会创造了省级异地商会中的多个“第一”。

我们商会是湖北省内成立的第一家省级异地商会。我上任之初，商会规模比较小，凝聚力不足，全省各地市浙江籍商会遍地开花。数量虽多，却未形成抱团之势。为改变这一现状，我奔走于众多商会之间，大力倡

2004 年，习近平、罗清泉为湖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成立授牌

导一个理念：浙商在湖北想要大发展，必须要有大团结。在我看来，一个商会的团结，最主要看会长。不是钱多就能当会长，最关键的是能不能付出。

为了推动大团结，我们大力发展会员，积极调研走访企业，使会员企业由2004年的187家，扩大到现在的12000家。努力发动各地市浙江籍商会加入联合会，截至目前，已拥有分会和团体会员43家，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服务浙商网络。

在我看来，运营商会跟管理企业是相通的，组织顶层设计是明确目标的第一要务。为了更好服务会员，我们成立投资与发展、维权和法律服务、公益慈善、文化传媒、会员发展与服务、金融服务、服务在鄂浙江籍大学生等十多个委员会；为了强化执行，我们不断优化商会内部组织机构，拓展浙江产品市场办公室、浙商回归和引进工作联络办公室，各部门分工协作，合力推进商会工作有序发展。

商会始终坚持政治引领，以“党建引会建，会建促发展”，推动党建会建融合发展，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非公经济领域的全覆盖。目前，商会党委下辖1个党总支、9个直管党支部、5个“双联双管”党组织，党员总数213人。全体党员都被选配充实到商会核心班子，商会整体政治素质和参与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为了大发展，我们商会作了大胆而又有益的尝试。首先，全力打造四个平台：信息共享平台、项目合作平台、维权服务平台和资源整合平台。通过这些平台，进一步创新服务手段，丰富服务内容，开展信息、融资、培训、维权、经营和投资服务。通过这些服务，形成有效的浙商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

以信息服务平台为例，我邀请软件公司收集一万多家会员企业的信息，调研企业需求，以大数据为切入口，通过建设会员管理系统，实现会员的个性化服务功能。我们商会与多家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累计帮助中小企业融资45亿元，银行授信贷款200多亿元，满足了不同层次会员的融资需求。

在全国异地商会中，我们商会率先改革会费管理办法，第一个注册成立投资公司。既解决了商会的经费问题，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渠道。

种种探索之路，实现了在鄂浙江籍商会和浙商的大联合、大团结、大发展。2012年，中组部授予商会党委“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2019年、2021年，全国工商联授予商会“全国‘四好’商会”荣誉称号；湖北省工商联授予“商会改革示范点”；浙江省工商联授予“品牌商会”“优秀商会”……这些荣誉给了我们最好的肯定。

目前，有46万浙商、21500多家浙商企业在湖北投资发展，总投资额达13000多亿元，涉及工业、农业、金融、能源、科技、医药、教育等诸多领域，年销售额10600多亿元，年创税200多亿元，安置了130多万人就业，累计捐款捐物7.8亿元。

湖北浙商已成为湖北经济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

既是浙商，也是楚商

2020年9月23日，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与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看望45名在鄂浙商代表。应勇衷心感谢浙江省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的大力支持和慷慨援助。他说：“各位浙商既是浙商、也

是楚商，既是浙江人、也是湖北人！”这份肯定，饱含信赖。

湖北有长江，浙江有钱塘江；武汉有东湖，杭州有西湖。湖北与浙江两省间，有着长期而密切的经贸交流和人员来往，两地人民友谊源远流长。浙江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改革起步早、经济发展快；湖北则是中部崛起战略中的“支点”。促进两省优势互补加快发展，是湖北和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重要工作，也是我们商会的目标。在促进湖北和浙江经济发展上，浙商从未缺席。

2004 年 5 月，商会成立时，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率 500 多人党政经贸代表团来鄂考察，并举行“2004 浙江—湖北经济合作签约大会”，共签约 176 个项目，投资总额 403 亿元，其中浙江省向湖北投资 375 亿元。

2012 年 4 月，湖北省政府指定商会参与承办“2012 鄂浙经贸合作洽谈会”，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率省党政代表团赴浙江考察。鄂浙两省代表团进行了多层次的经贸洽谈活动，并举办 2012 鄂浙经贸合作项目签约活动，共签定合作项目 31 个，项目协议投资 617 亿多元。

2014 年 5 月，在“2014 天下浙商湖北行暨湖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总商会）10 周年庆典大会”签约仪式上，鄂浙两省领导集体见证了浙商在鄂投资的 64 个投资项目、协议投资额 536 亿元的展示与签约。此举大大提高了浙商士气和在湖北投资的信心。

十余年来，商会共组织 300 余次投资考察活动。先后赴湖北武汉、鄂州、宜昌、咸宁、襄阳、孝感、荆门、黄冈、荆州、天门、潜江、仙桃及麻城等地投资考察。为浙江省政府及杭州、温州、台州、宁波、嘉兴、丽水、衢州、湖州、金华、绍兴、舟山、乐清、海宁、富阳等各级政府来鄂考察、洽谈投资项目牵线搭桥，取得了良好成效。

黄石国际企业港、华中五金机械产业园、湖北意邦环球商业广场、武汉东西湖保税区国际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等项目，都有湖北浙商的身影。会员企业在湖北长江经济带的投资项目，已占到会员投资项目总数的 70% 以上。

武汉港工业园，总投资 75 亿元，被称为华中规模最大的绿色工业基地；襄阳颐高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总投资 30 亿元，是湖北首个 O2O 商贸产业平台；人民电器汽车城项目，总投资 40 亿元，是武汉首个“第五代汽车城”……这些重要的工业园区都有浙商参与。

在企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湖北浙商也不甘落后：武汉长兴集团，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电气设备研发和制造的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轨道交通直流牵引配电系统，填补了国内空白，广泛使用于全国高铁系统，发展潜力巨大。武汉众泰数码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是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最新研制的大幅面高速激光内雕机系列，不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在国际上领先。

既与社会同行，也和时代同心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一个企业、一个商会，只有与社会同行、和时代同心才能永葆生机。在承担社会责任上，湖北浙商可以用“争先恐后”形容。

在支持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我作为商会会长，带好头才能号召更多浙商参与公益事业。2017 年，我的企业武汉锦绣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70 万元、商会出资 30

万元，帮助英山县龙潭畈村改建村里闲置小学，建设一所配套设施齐全的高标准幼儿园。

浙商胡定余20年来一直关心困难家庭教育问题，每年牵头组织开展助学活动。在2011年、2012年两次助学活动中，他组织爱心企业家捐款100余万元，资助了湖北256名学生。

武汉海山投资集团，2009年向武昌水果湖第二小学捐资100万元。湖北温岭商会，2012年捐款56万元改造红安县小学。2013年，安丰达公司、爱仕达集团，向安陆市文化事业捐款150万元……湖北浙商支持教育事业的例子比比皆是。目前，在鄂浙商共捐建了27所希望学校。

在赈灾扶贫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在鄂浙商累计捐款捐物6.2亿元。2008年汶川地震，会员企业累计捐款2821万元。2010年，会员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向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12万元。2011年，普提金集团向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捐款500万元，用于湖北扶贫事业。2016年，在湖北省抗洪赈灾新闻大直播现场，我代表商会和在鄂广大浙商上台捐款60万元，支持湖北灾后重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我和商会领导班子一直坚守在武汉，引领在鄂广大浙商积极捐款捐物，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组织在鄂浙商共捐款3270多万元，捐赠价值2500多万元的物资，并积极开展“浙医援鄂 商会助力”专项行动，为13支浙江援鄂医疗队、2018名医护人员提供后勤保障。

同时，我带队用9天时间走访慰问了13支浙江援鄂医疗队。为解决出行难、人员召集难、采购难、运送难等难题，我组织成立“党员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在抗疫一线奋战两个多月，充实后勤保障力量，共同筑起湖北浙商抗击疫情的坚固防线。

疫后重振，我们带头复工复产，先后多批次走访调研了50多家会员企业，在特殊时期多措并举，促进会员企业之间相互赋能、强化协作、共渡难关，为促进经济复苏、社会稳定提供支撑。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参与脱贫攻坚方面，我们浙商值得称道的就是产业扶贫。几年来，在参与“乡村振兴”“东西部扶贫协作行动”“对口支援新疆”“对口支援恩施”“对口支援大别山革命老区”等战略中，商会和会员企业投入精准扶贫资金1.2亿元，产业扶贫项目85个、总投资额230亿元，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10720户、36500人，其中安置7130户、20180人在家门口就业。

浙商李国能先后在革命老区红安投资建设“红城农批市场”，在武陵山区扶贫攻坚片区建设“浙商秭归中国脐橙国际交易中心”，打造服务“三农”重要平台，带动了2000多人脱贫致富。湖北玉如意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结对帮扶武汉新洲区汉子山村，流转当地农户山地350亩，建设青油茶生态基地。湖北商会28家会员企业在十堰郧阳区易家垭子村投资5.2亿元建设“新袜都”，年织袜4亿双、年产值过10亿元，安置扶贫搬迁的4000多户、15000人在家门口就业，成为湖北唯一入选2019年全国十大产业扶贫案例。

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先富帮后富。我们湖北浙商正在做出表率，彰显着自身的力量。

（许濛：《武汉文史资料》编辑）

“三硬商人”的桑梓情

◇ 李万军（口述） 严 濂（整理）

人物名片：李万军，湖北省陕西商会会长、中法文化（武汉）艺术交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省工商联常委、武汉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湖北省法学会理事、陕西省商洛市各界爱心济困协会会长。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治其心者，先诚其意。陕西商人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正因如此，陕西商人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我一直坚守着祖辈留下来的“原则”和“底线”，这是陕西人骨子里的东西。

缘起，武汉是福地

陕西商洛在地理位置上属于陕南。陕南和湖北接壤，被认为是秦头楚尾。那里，是我的故乡。

在来武汉之前，我曾是陕西一个国企的销售人员。当时企业要求我们在全国各地考察市场，寻找合适的机会设立办事处。1994 年，22 岁的我先是去了安徽和郑州进行深入的考察，后来机缘巧合才来到武汉。

在此之前，我对武汉几乎一无所知，但没想到武汉却成为我的福地。在武汉考察半个月之后，我基本摸清了武汉的市场情况：工业企业居多，产品需求量很大，市场也很成熟。于是，我带着这样一份考察报告回到了陕西。

1995 年，刚过完春节，我满怀着信心和期待从陕西又回到武汉。经过一番筹措，武汉办事处正式成立了。办事处的功能是立足湖北，辐射湖南、江西两省。当时我们对客户不熟悉，所以采用分销的模式。现在看来这一步是对的，随着分销的规模越来越大，品牌起来了，直销就顺理成章了。

一开始市场对我们产品的接受度并不高，而且竞争非常激烈。直到 1999 年的时候，产品才开始在武汉有一定的影响力，武汉办事处在全国办事处中也成为了佼佼者。但与此同时，我发现内心的憧憬里好像还有更

广阔的天地，于是开始考虑下海创业的事。当时创业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想闯荡世界，实现人生价值。

于是在 1999 年的时候，武汉优耐特减速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了。我们将公司设立在武汉市江汉区发展大道，毗邻汉口火车站的地方。从刚开始 30 平方米的门面起步，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把零售门面面积扩充到 300 多平方米，仓储面积也达到 800 多平方米。我们公司主营的产品有系列摆线针轮减速机、涡轮蜗杆减速机、系列齿轮减速机，其中高精度齿轮减速电机四大系列可完全替换德国 SEW 产品，标准齿轮箱系列可完全替换德国 SIEMENS 产品。我们的产品广泛用于冶金、化工、轻工、环保、起重、能源等领域，成功服务过中央电视台、武钢集团、昆钢集团、河北钢铁集团、太钢集团、东风汽车、中联中科、富士康、普利司通、中冶南方、湖北楚源集团等客户，并得到客户们的一致好评。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单一到多元，涉及的面很广，所以很快占据了地区行业的领先地位。正好那几年武汉工业发展处于旺盛期，我们生产的产品总是供不应求，每次到我们那里买东西的人都要排队。所以说，武汉是我的福地，也是我事业发展的起点。

立业，减法与加法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减速机行业的高端市场其实需求量特别大。于是，2001 年的时候我们就针对行业的高端市场，成立了武汉杰牌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全面负责杰牌产品在湖北地区售前、售中、售后的服务工作，公司产品主要用来替代进口产品。

然而，随着高端市场业务量越来越大，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两个团队的理念和习惯差距很大，于是我有了关掉优耐特门市部的想法。但是，说实话挺舍不得的，毕竟当时门市部一年也有上千万的销售额，这种矛盾念头持续了一年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到了 2005 年，我终于下定决心及时清零，彻底关掉门市部，逐渐放弃低端市场，主攻中高端市场。虽然当年公司的整体效益有所下滑，但到了第二年就基本恢复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以武汉优耐特为平台，做属于自己的品牌，主攻细分市场。实际上在做营销的过程中我们也掌握了一定的核心技术，刚开始我们就找工厂做代工。中央电视台新大楼里，减速机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自有品牌的产品，使用起来效果非常好。

2011 年，我在湖北荆州投资成立石首市御马石材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生产铁路道砟。道砟是铁路路基的粗沙砾或碎石，石质为特级花岗岩。工程会在铺设路轨之前，先在路基铺上一层碎石，再加以压实，然后才铺上枕木及路轨。使用道砟可以使排水顺畅并容易调校路轨位置，同时由于道砟把列车及路轨重量分散在路基上，故能够减低列车经过时所带来的震动及噪声，令乘客的乘坐舒适程度增加。我们这家公司拥有铁道部颁发的特级资质，年产铁路道砟 150 万方。因为搭上了铁路扩张发展的快车，御马石材有限责任公司很快成为业内知名的供应商。

2012 年，武汉市通过《智慧城市总体规划与设计》，武汉把探索智能停车之路作为向智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看准智能停车市场的前景，我又成立了武汉鑫集达智能停车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两年的时间里，鑫集达智能停车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就在武

汉拿下多个项目，成为武汉智能停车领域增长最快的企业之一。

2014 年 3 月 26 日，在中法两国元首的见证下，两国政府代表在巴黎签署《关于在武汉市建设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的意向书》，生态城项目正式落户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中法生态示范城的发展定位为：中法低碳合作与技术交流的平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典范、国家级生态环保型产业示范基地、产城融合发展的生态宜居示范区。

因为看准了文化交流的大趋势，再加上在法国也有一些资源，我开始积极参与中法文化艺术交流这项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 2016 年成立中法文化艺术交流（武汉）有限公司，立足于武汉市蔡甸中法生态城，致力于全面促进中法文化艺术交流。通过中法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法国葡萄酒博物馆，推动法国红酒知识普及、法国红酒展示及投资交易，中法艺术品拍卖、交易、鉴定等。公司着力为广大客户提供一个可信赖的交易平台，打造具有特色性、地标性、国际性的文化知性交流平台。

李万军与时任法国驻华大使顾山、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马天宁就中法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项目进行交流

企业家的眼界决定企业发展能否长久，为了开阔眼界，我曾走进武大 EMBA 班学习企业管理的相关知识。老师讲的理论，我们在现实的生产经营中每天都在用，学习之后就好像捅破了理论与实践中隔的一张纸，让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有哪些好处。通过系统的学习，我可以给企业重新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清晰组织构架、人员定岗定责、分级授权，让企业走上更快的发展道路。

克难，温情系乡梓

创办湖北省陕西商会是几代在鄂打拼的秦人的梦想，也是我心中酝酿多年的计划。

在这之前同乡之间的交流多在同乡会等非正式组织中，随着老乡群体越来越大，“同乡会”已经无法满足老乡之间交流的需求，成立商会迫在眉睫。事实上，在筹备商会的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以为就是牵个头，把商会先办起来，然后可能还是更多关注自己的商业板块。但是这个事一旦做下来以后，完全不能丢手，慢慢就把我大部分的精力投入进去了。然而，创立商会没有想象中容易，前期组建需要耗费很多的精力，商会从无到有的创办过程，远比创办公司要难得多。当家人和企业员工发现你竟然把 90% 以上的精力都花在商会上时，他们会认为这不值得。身边很多朋友也不理解，甚至是冷嘲热讽，这是很让人难受的。

于我而言，创办湖北省陕西商会足以称得上是一件实现

人生价值的事情，困难再多也要迎难而上。在筹备组的共同努力下，2014 年 5 月 18 日，湖北省陕西商会挂牌成立，几代在鄂打拼的秦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从此，我的肩上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通过不断举办活动，来自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医药医疗设备、互联网、电器经营、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仓储物流、汽车及零部件服务等不同行业的会员们开始通过商会平台相识相知，相互合作。老乡之间联络感情之余，在生意上也互帮互助，商会真正成为在鄂陕西人的情感纽带。

2015 年，湖北省山陕两省老乡困难救助点揭牌

回顾商会第一届五年的点点滴滴，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事就是“山陕面馆”的落地。人不管走到哪里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美食，在这之前，在武汉的老乡就很难吃到一顿正宗的家乡饭。所以在商会成立第一年，由我兜底，成立了商会平台下的第一家众筹合伙制企业——山陕面馆，以地道的山西、陕西美食为在鄂乡党提供家乡的味道。

这不仅是一家普通的面馆，更是秦商在湖北做公益的一个聚点和载体。在面馆开业当天，湖北省山陕两省老乡困难救助点也随之挂牌。其主要功能是支援救助在湖北生活困难的山陕两籍人士。我曾经碰到过数次，有陕西人在武汉落难，可能是钱包丢了，当时通信还不发达，走投无路，想回陕西没有路费，非常窘迫。困难救助点成立以后，但凡有陕西人落难，来到面馆求助，首先不会饿肚子，通过自发的民间基金，可以为他们提供返乡路费。

山陕面馆运行一年多后，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带着他家三代数口来吃饭，听闻面馆救助点背后的故事后，要求与我见一面。见面的时候，老人家颤抖着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来武汉几十年了，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多陕西人，你给咱们陕西老乡搭建了一个好平台，我们要感谢你！” 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更加说明我们搭建商会这个平台，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事实上，商会的平台价值和意义远不止此。

2015 年，襄阳 64 岁陕西人王忠贵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一家人生活面临崩溃的边缘。湖北省陕西商会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发起爱心捐赠活动，仅一天的时间，就有 95 名会员响应并自发捐款 36101 元。不仅如此，我还与时任襄阳市陕西商会会长李庆珍商议，继续跟踪情况，并与相关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发动社会力量，为老人在后期的生活多尽一份绵薄之力。

2016 年 7 月，受持续强降雨恶劣天气影响，武汉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由于承担着洪水调蓄和分洪的重任，武汉市蔡甸区受灾相对严重。得知消息后，商会秘书处通过商会 QQ 群、微信群等线上交流平

台实名接龙，短短 24 小时，近百位会员积极行动，募集善款物资超过十万元。7 月 12 日，我带领商会会员代表一行十多人前往灾区慰问，将救灾物资送到蔡甸区。

圆梦，凝心以聚力

目前，湖北省陕西商会有 700 余家会员企业，会员单位遍及武汉三镇。以陕西人的睿智、忠厚与勤奋，商会凝聚了一大批具有战略思维和实干精神的优秀企业家，为商会的稳定运行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北省陕西商会自成立以来，在促进会员企业的对外交流、投资发展、慈善帮扶事业、为家乡招商引资等方面起到了强大的社会作用。商会先后与全国各地陕西商会结成友好商会，加入全球秦商联合会，定期参加全球秦商大会；加入湖北省工商联，积极互动，拓展资源，共促发展，荣获湖北省工商联颁发的招商引资优秀组织奖；组织会员单位先后救助老乡于危难，赈灾献爱心；积极参与武汉市的扶贫攻坚工作，荣获 2015 年度全球秦商爱心慈善奖；积极为家乡经济建设招商引资，陕西省韩城市、宝鸡市金台区、铜川市印台区先后在商会设立招商联络处。

在会员服务方面，优化商会组织结构，落实商会主要核心领导责任主体，有条不紊地推动会员问诊走访制度；建立党支部，引导会员积极入党，提高政治觉悟；利用商会律师团队，开办法律培训，成立湖北省陕西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会员企业排忧解难，保驾护航；联络全球秦商资源，加强秦商圈层结构整合，挖掘秦商精神内涵，扩大会员发展视野。

成立五年来，湖北省陕西商会以其拥有的庞大社会、人脉、经济、信息资源，在促进会员企业发展、促进湖北与陕西经贸文化合作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在承接委托招商、会议展览、投资考察、文化礼仪、旅游推荐、融资服务、学习培训、校企合作、商务整合等方面为陕西各级政府、两地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提供大量优质便利的服务，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已经成为在湖北、陕西都有较大影响力和公信度的社会民间组织。

我觉得，乡情是纽带，商业是载体，商会就像托盘，把这些东西托起来了。

在工作之余，我还喜欢研究历史，并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修《资治通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希望通过学习历史，从古人的故事中得到现代的启迪。

真正的智慧总是与谦虚勤勉相连，真正的哲人必然像大海一样宽厚。人生的意义在于自我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创业初期改善生存环境是主要目的，而现在做企业于我而言更多的是要实现人生的价值。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凡事须从大处着眼，我觉得人生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个人，更多的应该是实现合作和共赢。

出身在秦地，立业于荆楚，是陕西和湖北的两方水土共同滋养了我。可以说，湖北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总听人说，回不去的是故乡。回首陕西秦地，那里有我来时的路，也是我的归处。而现在湖北这个第二故乡，有我的未来，还有我的远方。

（严濂：《武汉文史资料》编辑）

我是“玩泥巴”的勘察人

◇ 徐 凡（口述） 白爱萍（整理）

别小看泥巴，它里面可蕴含着大学问。

而我，就是一个“玩泥巴”的勘察人。从事土工试验工作 20 年，全国各地的土样到了我的手上，经过肉眼和触感的直观判断，我就可以评估出土层的物理和力学性质，达到评估数据和实测数据基本吻合。

我叫徐凡，是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试验室的一名土工试验员。2017 年 7 月，我荣获全国第一届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土工试验技能竞赛一等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称号；2019 年 1 月，我被评为第二届武汉“大城工匠”；2019 年 9 月，我成为第三届湖北省“荆楚工匠”。

一

我是 2001 年从一冶职工大学毕业后进入土工试验这一行业的。

土工试验是建设工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工业与民用建筑、城市轨道交通还是港口码头，开工建设前都必须进行工程勘察，对项目所在地的岩土样品进行检测，形成报告为后续设计施工提供准确测试参数。

进入中冶武勘时，我是一名派遣制员工。但我并没有看轻自己，也没有看轻这份工作，我明白唯有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在工作中，凡事力争第一，为了学技术，中午同事们都休息了，我抓紧时间“充电”，对照规范自行练习岗位技能，把自己的测试数据与老师傅们的进行细致比对、纠偏。一点一点，从“质”到“量”，我对自己的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每学会一个单项试验，我都会给自己鼓劲。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坚持，我的岗位技艺越来越纯熟，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2 年，我通过自学，取得了湖北工业大学的本科文凭，同年，我成为中冶武勘第一批以派遣制身份被聘为专业岩土工程师的员工；2016 年，我成为了中冶武勘的正式员工。

回顾这些年来走过的路，我深刻体会到，挑战自我，不懈努力，终究会迎来成功。

二

从业 20 年来，我始终秉持着对自己经手的每一个数据负责的初心。

做土工试验时，大多数项目是不能戴手套的，经常是摸完泥巴洗手做记录，然后再接着摸泥巴，反反复复。每当到了冬天，天气寒冷时，我的手因为经常见水，就会出现皮肤皴裂出血的情况。做试验时需要长时间站立操作，还经常需要弯腰低头。只要有大项目下来，工作就得加班加点，我和同事们经常从早上 8 点忙到晚上 10 点，中午也

徐凡在试验室工作

吃不了几口饭。不少人因长时间的站立，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和颈椎病，我也一样。

尽管如此，我和同事们严格把控质量关。质量是工程建设的生命，做土工试验更需要严谨的工作态度，试验数据必须真实客观地反映土质条件，为后续的设计和施工提供正确的参数。由于土工试验入门简单，技术性不算很高，加上行业内没有系统的规范管理，于是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小作坊”式的试验室。他们根据经验估算数据，提供虚假的测试报告，给勘察行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给施工带来安全隐患，对此我深恶痛绝。我和同事们每年要完成几万件样品、几十万个测试数据，这些数据都是我和同事们用双手一个一个地从试验操作中测试出来的。每年，我们的报告合格率均为百分之百，顾客投诉率为零。

三

勘察工作不只是穿着白大褂，坐在试验室做试验那么轻松，我们经常需要出外业。其间的酸甜苦辣，我通过两个小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2008 年我在上海连续出差 4 个月，眼见着到了 11 月，还有两个多月就要过年了，公司准备让我换班回武汉休息。正在这时，山东烟台公司刚承接的项目需要年前完成外业勘察，工期十分紧张，而且必须提交中间资料。公司问我能否坚持把这个任务接下来，我二话没说，当天晚上就打包了试验仪器并联系好发往山东工地的货车托运设备，并于第二天赶赴工地。

我带的随身衣物，还是 7 月到上海时的夏装，11 月时也就买了件外套，到了烟台才发现那里的温度已经降到零摄氏度左右。外业工作已经开始，不能因为土工试验影响工期，我匆匆忙忙地购置了一件军大衣，就开始了试验设备调试工作，仅用一个晚上就将设备调试完毕。

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和方便工作，我在工地附近租了一间农房建立起了试验站，将做试验和睡觉的地方合二为一。北方的农村，睡的都是炕，烧起来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人是很舒服，但是给工作添了麻烦。土工试验的很多数据对温度和湿度有要求，样品里的水分因人为或环境因素过多流失，会导致数据异常，给工程设计带来错误的信息。炭炉没有办法调节温度，室内的温度过高不利于试验，怎么办？我看着门外将近一尺厚的积雪和屋内烧得正旺的炭炉，一咬牙打开了门，让室外和室内的温度中和，在房间选取最佳位置，重新摆放调试设备。两个月的工期，我就一直处在这样“冰火两重天”的环境下，完成了全部的土工试验。

由于是临时建立的试验站，没有全自动设备的支撑，为了不延误工期，我每天晚上都读数到两三点钟，保证所有的试验项目在 24 小时之内完工，仪器也是满负荷运行。不久，我的双手双脚和耳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冻伤，特别是双手，胀得像猪蹄似的，

做塑性试验的时候一碰就龇牙咧嘴地疼，疼得头上直冒汗。就这样，我硬是咬牙坚持了两个月，完成了所有样品的测试工作，没有一个数据是偷工减料不经过实验估摸着编写的，给勘察施工提供了最准确的设计依据和参考。该项目最后获得了全国冶金行业优秀工程勘察二等奖，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好褒奖，再苦再累也值了。

另一个故事，我称之为“127/128的坚持”。

2009年9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80万吨/年乙烯工程核心厂区岩土工程勘察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是我国中部地区首个大型炼化一体项目，包含17个子项目，总体勘察费用将近700万元，涉及室内土工试验全部的参数指标，是试验室成立以来武汉地区承接到的最大最复杂的工程。

我知道这个项目的意义重大，暗下决心一定要打个漂亮仗！

作为这个大型工程的专业负责人，我除了要参与核心技术的操作以外，还要安排好生产。土样多、项目复杂、工期紧，外业主体项目与子项目交叉进行，每天送过来的样品有好几百个，我要根据不同的区域、孔号、规格进行区分。为了保证每天早上试验室其他的同事能顺利进行开样工作，我每天从下午开始就要进行编号，蹲在地上逐一核对样品，一蹲就是五六个小时，站起来的时候两眼发黑，脚麻木得都不像自己的。

我每天根据前一天的生产情况，做好下一天的开样计划，既要保证工作量的同时，又要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这可真不是个轻松的活。编号工作一般到晚上7点左右才结束，我匆匆忙忙扒两口饭或泡一包方便面就解决晚餐，然后填写各类开样记录，到晚上8点钟再整理资料、汇总数据，不知不觉地就忙到了半夜转钟。我对自己说，所有的工作都要做到仔细认真，避免因自己的马虎出现第二天生产运转不开的情况，耽误工期。这个项目进行了128天，我足足重复了127天这样的模式，包含节假日。唯独一天例外是女儿出生那天，我没有赶得上送妻子进手术室，也没有赶上聆听女儿的第一声哭声，仅仅在医院待了1个小时，看到母女俩都平平安安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2010年2月中旬，该项目结束，全部的土工资料近1个立方米，200多张报告，近40000个数据，精度从小数点的左3位跨越至右8位，我们全部合格，做到了零失误零返工，满足了工期，保证了质量。这个项目不仅获全国冶金行业优秀工程勘察一等奖，同时还荣获2016—2017年度国家优质金奖。

四

参加工作以来，我最大的财富是在土样测试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几个厚厚的笔记本。每年，我手触摸过的土样品没有一万也有好几千件，每接触到一个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土样，我都会进行事前预判土的物理力学参数，然后通过实测指标进行比对、归纳和总结。就这样，我渐渐地练就了“徒手测土样数据”的绝活。每当有异常数据产生，同事们都喜欢来咨询我，通过我对土样的经验判定，精确地找出从取样到制样到试验各个环节中哪里出现了问题，进行重新测试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同事们笑着说，我是试验室一台不用充电的“全能测试仪”。

我还先后和同事们开发出第一代岩石多功能直剪仪，当年就给试验室创造了十来万的经济效益；研制出室内基床系数试验测

试装置，摆脱了该试验只能通过现场测试的方法，填补了国内室内测试基床系数标准方法的空白，该设备与测试方法 2012 年获得了 PCT 英国专利。2016 年我研制出一种自动扫描抵消含水率盒重的装置，缩短了称量含水率试验近三分之二的操作时间，同时将错误率成功降至零，该装置被广泛推广应用，大大提高了该行业的工作效率。

我并不满足于此，渴望在更大的舞台上磨砺提高自己。

2017 年，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准备举办全国第一届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土工试验技能竞赛。消息传来，湖北省暨冶建行业举办了选拔赛，从 9 家单位选拔出 8 名选手代表湖北省及行业参加全国赛。经过精心准备，我以行业第一名的成绩代表中冶武勘参加全国赛。

公司为这次大赛制备了培训计划，大家都奉献出各自平时在工作总结的心得和技术要领，汇编成教案，由资深工程师们给我们讲解。每天晚上，我都会学习到 10 点钟之后，甚至到 12 点，仔细琢磨操作规范里的每一条要素，一点一点地抠细节、抓重点，从理论延伸到工程实例，再用实例验证理论；同时，翻阅大量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数据报告，从中间找出疑难点和工程特例，反复进行数据计算模拟演练过程。

尽管做了十几年的土工试验，对土样的操作了如指掌，但我依然保持着初学者的心态，一次次掐表提速，一次次小细节纠偏，每一秒钟的加速都代表着自己的一次进步，每十分之一毫米的精度都代表自己操作能力的提升。在上下班路上，我的脑海还在反复推演考试项目的每个操作细节。能参加全国赛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大家的水平本就在毫厘之间，一个小细节没有把控好，最终可能就与奖项无缘。一本《土工试验操作规范》我随时带在身边，饭前餐后翻一翻，睡前醒后看一看。

短短两周的备赛期，我在理论和实操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闭上眼睛，从实操细节的 12345 到计算公式的 ABCDE，我都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有一天早上妻子笑着告诉我说，头天晚上我说梦话，把操作流程大声地背了出来。

2017 年 7 月 6 日，在云南的比赛现场，我和全国 27 个省市 110 多个勘察设计单位的 150 名土工试验技术能手同场竞技，通过两天理论加实操的比赛，最终我获得了全国赛的一等奖，并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这个奖项是对我多年坚持、努力和执着的最好回报。

五

朴实无华自芬芳。

与泥巴打交道 20 年，我付出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看到我经手的测试数据，为众多建设工程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深感欣慰和自豪。泥土是朴实无华的，正如我的工作，但它要求严谨认真，容不得一丝浮躁和虚假，这也养成了我慎终如始、精益求精的作风和个性。

现在国家对勘察行业越来越重视，公司也给我们试验室配套了近 800 通道的全自动固结设备及 30 台套全自动三轴设备，展望未来，我信心十足、干劲满满。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是追梦人舞台，我将奋力前行，不负韶华。

（徐凡：中冶集团武汉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土工试验员；白爱萍：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工运》编辑）

厚植为民情怀，牢记医者本心

◇ 侯立新（口述） 郑雅飞（整理）

人物名片：侯立新，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立新中医院院长、武汉好人圈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武汉市江岸区民营医疗行业工会主席、湖北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

我叫侯立新，是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立新中医院院长。有人说我是“中国好人”、道德模范标兵，但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一生的追求。

我出生在革命老区大别山麓一个中医世家，家族七代行医。“医者仁心、悬壶济世”，既是中医世代相传的医训，更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家训。我的父亲侯奕田在抗战时是一名新四军战地医生，在军营里为抗日将士疗伤。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医，在父亲言传身教下踏入中医世界，后来又师从“国宝级”中医章真如。渊源家学的潜移默化，授业恩师的谆谆教导，让我不仅学到了中医医术，更传承了中医文化。

“人生的快慰不是在享受幸福，而是在创造幸福；不是在创造个人幸福，而是在创造大众幸福。”这句话，自我大学毕业后就悬挂在卧室的墙上，伴着我一路前行。

万水千山走遍，千方百“剂”救人

穿过密林，寒风呼啸，扫荡着峡谷岸边的枯枝落叶，刮得人晃晃悠悠。这是在去恩施州鹤峰县铁炉乡渔山村的路上，我们一行人前来给村民义诊。眼前，一根毛糙的钢绳横跨千米，在距地面千米的高空中晃荡，嘎嘎作响。这钢绳不知多少年份了，拴着一个破钢筋笼子，人站在笼子里，颤颤巍巍滑向对面。往下看是不敢的，我抓紧笼子，目视前方，脚下放着两百多斤的药材。

当铁笼子在空中四次悬停的时候，缆绳似承受着千钧之力，我们听到“喳喳喳”像要断裂的声音。同行的湖北电视台记者脸

色发白，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侯医生，您就不害怕？我们今天恐怕都要把小命交代在这儿了哟！”我大笑，说了心里话：“要真是在做善事的时候，命被收走了，那也是一种天意啊，没什么好遗憾了！”终于到达对岸时，乡亲们激动地把我们抱着举起来，大声欢呼，笑声震天。我们也笑了，是惊吓之后的庆幸，也是被乡亲们朴实的热情所感染。

那是在2012年底，我带着药材，带队冒险乘坐索道。同去的有全国道德模范孙东林、王争艳、杨小玲、刘培、刘洋和20多名爱心人士。大家翻山越岭进村后，村子里立马热闹起来，蜂拥前来就诊。我们从下午2点开始，不挪窝地给乡亲们看病，把脉、针灸、按摩、推拿、送药、制剂，一直忙到晚上8点……

我离开的时候，心里为乡亲们的病痛和生活不便而叹息，脚步沉重。突然像有一根绳子把我往回拽，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跟着送行的乡亲们“抢走”了我的工作服。他们说：“侯医生，您的这件白大褂就当作我们的一个纪念吧。”我一时哽咽难言，只有连连点头。我的衣服留在了那里，我作为医生的一颗心，也时时牵挂着这个荒僻山村可爱的乡亲们。

来年4月，我翻越八个半小时的大山，再次来到鹤峰义诊，头年乘索道的惊险一幕浮现眼前，便有了捐款修索道的想法。但咨询相关技术人员，修索道需要一大笔钱，钱从哪里来？当时我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因要做手术准备了一笔钱。我是个医生，随时能照顾到自己的病情，可鹤峰的百姓坐上那索道缆车时生命毫无保障！更不要说因为出行不便，延误病情的村里老人了。

于是，我毅然捐出了准备做手术用的10万元，两位爱心人士各捐赠1万元，孙东林代表湖北信义兄弟农民工基金会转赠5000元。2013年8月30日，索道桥捐赠及开工仪式在渔山村山顶举行。索道修缮一新、重新加固，钢筋笼子换成了由钢板做成的封闭轿厢，小山村的村民终于能够走出去了！此事经过媒体的报道，使得渔山村顿时成为社会爱心人士的聚焦点，政府部门对当地的发展重视起来。2017年，渔山村修通了水泥路。这里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吸引了大批游客，穷困村变身为观光村、富裕村。

这只是我脚步所至的一个地方。自1982年正式挂牌行医以来，我几乎每天都有义诊的病人，除此之外，我还会深入贫困乡村为群众免费送医送药，义诊行程超过100万公里，义诊人数达200万人次，累计送医送药总金额超500万元。我做的，比我说的要多得多。

播撒爱心种子，用一圈人带动一城人

2013年，在江岸区总工会举办的“爱心环卫行”活动中，大会宣布由我担任区城管局3900名环卫工人的保健医生。这时突然有一位中年妇女站起来：“你管环卫工人，那你管不管我的孩子啊？”我问：“你的孩子？得了什么病？”她说：“脑瘫，一出生就脑瘫。”我说：“好，没问题！”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这片掌声也激励了我的信心。之后，我坚持连续十年免费上门给这个孩子做针灸。孩子经过治疗现在能够正常行走和言语表达，具备了生活自理能力。孩子的家人很信任我，为方便治疗，将家里的钥匙也交到我手中。

病人的家门向医生敞开，病人的心也和医生连在了一起。这一举动给了我极大感

触，并且这不是个例。我在常年的上门义诊中，接手了许多瘫痪在床、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病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放心将家门钥匙交给我，每次我去问诊，就仿佛见到了亲人。这样的钥匙一共有近百把，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钥匙医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把自己比作一把钥匙，承载着病人们的信任，也期望开启一段段温暖互信的医患旅程。

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为带动更多的人乐善行施，我于2015年1月组建“武汉好人圈”微信群，2016年6月日注册成立“武汉好人圈志愿服务协会”，将多年来一起做好事的全国、省、市、区道德模范，以及岗位标兵、爱心人士等“圈”在一起，搭建起武汉好人圈平台。通过平台，大家可以了解困难群众需求，根据需求帮助他人，同时吸引更多社会爱心人士加入。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人家不理解，说你是个“苕”。但陆陆续续有成千上万、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加入“好人圈”，我们一起去行善事、做好人，这个团队的影响力就逐渐扩大，磅礴的正能量汇聚起来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武汉好人圈集中了全国各地120多名中医医护人员，成立“武汉好人圈抗击新冠肺炎中医防治及心理疏导志愿服务队”，积极投入到患者救治工作中。志愿者们不顾个人安危，承担道口检疫、社区管理、健康教育、医学咨询、开设家庭病房、编印宣传资料等工作。至武汉解封，免费用中药防治近万人次，用中药一、二号方和天然白首乌片剂治愈200多人，弥补了单一用西药的不足，为患者恢复健康实现提速，社会反响非常好。

2020年3月，武汉好人圈协会受到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通报表扬，荣获“中国社会办医战疫纪念章”。2021年7月29日，国家信访局就武汉好人圈志愿服务队致习近平总书记的信，回信称：“你们在武汉疫情紧张时期主动‘逆行’、直面危险，捐赠防疫物资，参与社区防疫，为抗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令人敬佩。让我们坚持志愿精神，多行善事，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钥匙医生”侯立新

如果我是一滴水珠，这滴水珠在树叶上面，很可能会被阳光和风蒸发。但若流进溪流，汇入江河，那就可能形成浪涛，奔腾不息。一个人、一个人，再加一个个人，最终形成的是团队的力量，就好比水珠汇入江河湖海。有人说我很能，我说不是，这是团队的能量；有人说我很行，更不是，那是团队的智慧。

倾听民声，老百姓是最大的政治

作为一个医生、一个政协委员，我信奉这三条准则：第一，心病还需心药医，医生要与病人心连心；第二，对症下药，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第三，在参政议政的基础上关注民生。老百姓是最大的政治，为老百姓防病治病，能够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做点什么，这是值得欣慰的。病人能相信你，你就是他的保护神；病人不相信你，不能和你交流沟通，听不到病人的心声，何谈民声？

当选政协委员是一种荣誉，但如果仅仅把“委员”当作一个头衔、一种光环，甚至当饭吃，那是一个空有其名的委员。我连续三届当选市政协委员，提交了上百件提案，大部分都是关注民生的，有一些在全市范围内是首次提出，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如《为老旧小区安装电梯》《建议增加汉口姑嫂树互通出入口》《关于加强我市文明智能养犬管理系统的建议》《关于开放引进共享电动自行车，加快我市绿色低碳慢行系统建设的建议》等等。我认为，作为一个委员，应该把委员的职责放在肩上，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中。承担社会责任不是停在口里，而是放在行动上。

2006年，我刚刚当选政协委员的时候，刘善璧主席就拍着我的肩膀，说：“恭喜你当政协委员，但我想问一下，政协委员究竟是干嘛的？”我说：“我是一个新委员，啥都不知道呢。”刘善璧主席说：“我告诉你，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第一任务；其次，了解民众的疾苦，是重中之重；第三，多交朋友，交知心朋友，为共同致富、共同发展作出贡献。”当时我就感觉这个老主席，太了得了。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能够在工作中帮助别人，是因为别人相信你。别人相信你，你帮助了别人，别人再反哺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大家庭。你有，我有，大家都有，共同创造财富，这才是真正达到了社会共赢。

在2016年市政协全会上，我做过《加快城市道德文明的步伐，好人圈助力在路上》发言。湖北有“千湖之省”、武汉有“百湖之市”之称，武汉桥梁多、湖泊多，我曾建议设立武汉湖泊博物馆、桥梁博物馆。而武汉要在城市文明方面登上新的台阶，为武汉文明城市保鲜，更应当建立武汉当代英模馆。这一提议被市委、市政府重视与采纳，我组织的武汉好人馆、建议的当代英模馆在市民之家得以开建。两馆展示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英雄模范的善行义举，旨在弘扬真、善、美，传播道德正能量，进一步提升市民的道德水平，提升武汉“暖实力”。

回望40年的行医生涯，我一直在努力做一辈子的好医生。如今步入老年，在看诊之余撰写了《亚健康中医防治》《经络纲目》《千方百剂》等著作，总结行医经验、治病药方、保健知识，送给有需要的朋友，让大家少花钱、不花钱，强身健体，享受健康的快乐。初略估计，这些年送出书藉达近10万册，从未收取分文。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连任三届的武汉市政协委员，心怀感恩，承担点社会责任也是应该的。有的人说了，不做；有的人做了，不说。而我信奉的，是言论与行动一致，既要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又要倾听他们的声音，为民众利益而鼓与呼！

（郑雅飞：《武汉文史资料》编辑）

一位老台盟人的对台工作感悟

◇ 吴 晖（口述） 唐红漫（整理）

人物名片：吴晖，武汉市政协委员、台盟湖北省委联络部副部长。

近年来，由于岛内民进党当局蓄意“谋独”，以及外部敌对势力的影响，台湾政治生态愈发趋向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的方向发展，台海局势愈发紧张。

目睹十几年两岸关系的变化，作为一个出生在大陆的台胞，一名老台盟人，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但越是在这样特殊的时间节点，越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两岸同胞交流合作越是不能停、不能断、不能少。

从20世纪80年代两岸共同推动打破隔绝状态，到两岸关系正常化，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至2008年后开创两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的新局面，我们的对台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是紧跟时代，因时制宜。

转变思路，展现大陆新风新貌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

在具体的对台工作中，我一直秉持的也是这个思路。40年前，台湾经济蒸蒸日上，远远走在大陆前面；40年后，大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最主要的投资对象，两岸加速形成“一日生活圈”，融合发展程度加深。然而，只有台胞切实参与到两岸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深入到大陆同胞的日常生活中，才有可能增强民族认同感，感受到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2015 年全国台企联青年团前往恩施助学

多年的基层工作实践，使我了解到很多在湖北的台胞，都有做公益做慈善的习惯。工作之余，他们会三三两两找到居住地附近的福利院或孤儿院做义工献爱心，遇到灾害发生也会主动捐款捐物。只是这个群体体量太小，力量有限，这些善举很难被大陆民众注意和了解。因此，我考虑将这些较零散的个体行为，转化为有组织的群体集中活动，配合相应的宣传报道，使之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助力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遵循这样的工作思路，从 2011 年开始，在盟省委的支持下，我们开始引导台湾同胞，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初期，我们把扶贫重点区域定为恩施，组织台湾同胞开展捐资助学。

那时候，从武汉到恩施交通没有现在方便，一次单程要 7—8 个小时，各方面条件也十分艰苦，什么东西都需要自己带，包括纯净水、卫生纸这样的小东西。当时山区的办学条件很苦，没有通水泥路，车开不进去，只得扛着捐赠的物资，爬山路送到学校。山区学校有很多留守儿童，长年与父母分隔两地得不到关爱，随团去的一些台湾青年，陪他们读书、游戏，很快交上朋友。留守儿童很喜欢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台湾青年也自此有了牵挂，隔三岔五前去看望。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有位小朋友说，读小学一年级就认得其中一个大哥哥，一直到六年级，这个哥哥年年都来，太开心了。

组织这样的扶贫工作，还产生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影响。从 2011 年到现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参与下，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们去恩施扶贫什么都得自备，现在恩施和大城市一样，用手机“点一点”，衣食住行都能解决。交通愈发便利，山里人的房子也越盖越气派，乡镇经济发展，教学条件改善，很多孩子的父母纷纷回到家乡，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台湾同胞们自己亲眼所见、亲身体会到的，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加了对大陆的认同感。一位台湾青年感慨道：“台湾从桃园机场修一条地铁到台北就花了十多年时间，而这十年，湖北省这么偏远的山区都通高速高铁了！”

带动台胞参与到大陆的发展建设工作中，感受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创未来的坚定信念和强大动力，产生了深入人心的宣传和鼓舞作用。近几年，我们推广了这样的工作模式，逐步带领台胞深入到十堰、长阳、黄冈等其他贫困地区，均收到很好的效果。

创造条件，深化两岸青年融合

我们一直很重视做台湾青年的工作，早在2009年就与省台联会一起启动“两岸同心义诊”项目，组织台籍医务工作者和在汉就读医学专业的台湾学生，为困难群众开展义诊。这个活动一方面帮助台湾学生增加临床经验，学以致用；另一方面也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深入农村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新农村建设成就、了解大陆基层社会的机会，体现了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骨肉亲情。

中央强调两岸融合要往深了去，我们这些年的工作也正好契合了这一思路：从刚开始团结台胞一起做公益项目，到组织台胞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再到从今年开始，我们将对台工作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引导台胞往乡村去、往山区去。

有一位在汉台湾青年，长期参与扶贫工作，与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官田小镇合作成立湖北九品香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把台湾的九品香莲引入鄂州。该莲花品种集观赏性、药用性、食用性为一体，还有极强的净化水体的功能。在当地政府和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当地一个臭水塘被打造成有文创性质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同时，该公司以劳务雇佣和土地流转等方式，带动当地老百姓共同富裕。这位台湾青年，成为台胞主动参与乡村振兴、融入当地发展的代表。

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我们还重视引入台湾专业人才，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厘清思路，提供技术指导。十堰市张湾区西沟乡，是台盟省委对口帮扶点，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我们邀请台湾专家深入调研，出谋划策，帮助该地结合地形地貌和产业结构做发展规划，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和人员培训工作，为乡村集体增收打下基础。同时，多次组织乡村干部外出学习，为做好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拓宽思路。在脱贫攻坚战中，处处展示我们的台胞作为、台胞力量。

2021年7月，因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我被台盟中央评为“全盟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增进共识，助力台企在汉发展

武汉台企总量不多，且体量不大，抗风险能力较弱。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很多小微台企直接面临生存压力。我们一方面积极联系相关职能部门为台企减负，另一方面为他们牵线搭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有家小微台企叫红薏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刚到武汉不久就遭遇疫情，创办人、台湾青年导演薛颖橦情绪低落，每天和台湾亲友视频，哭诉自己遭遇的困苦。后来在我

2020年10月开展两岸同心义诊恩施行活动

吴晖（左一）与列席市政协会议的台胞代表王天山

们的引导下，走出家门，参与到社区志愿活动中，积极发放物资、入户排查、组织核酸检测等；并发挥特长，通过自己的视角，用镜头记录医务人员、社区人员、志愿者的抗疫事迹，制作成纪录短片《76 天——中国台湾导演在武汉》。

这部纪录片，被我们推送到台盟中央，经多家媒体传播报道，打响了知名度，也被武汉市档案馆收藏。同时，纪录片在台湾岛内播放，帮助台胞深入了解武汉抗疫的真实情况，破除民进党当局的不实宣传。

2021 年 4 月 10 日，为庆祝武汉重启一周年及响应外交部举办的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薛颖橦发起了一场名为“台湾同胞闪聚武汉，白云黄鹤欢迎你”的快闪活动，全国各地台湾青年代表 60 余人齐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广场热情歌唱，被海内外 20 余家媒体报道。如今，“红薏米”已经在武汉站稳了脚跟，公司发展稳健，正在筹拍反映辛亥革命历史片段的纪录片——《历史选择了武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遇和不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呼吁台湾同胞也需要更多了解和理解大陆 13 亿同胞的感受和心态，尊重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坚持“两岸一家亲”，就是同胞间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坚持“两岸一家亲”，就是同胞间要真诚相助，维护增进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只要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只要是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两岸双方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

下一步，我们打算推动台胞更加深入地融入湖北、融入武汉经济社会发展。如将慈济会等台湾社会公益组织与本土公益慈善机构进行对接，推荐有代表性的台胞加入青联、妇联等组织，邀请创业辅导老师为台湾青年提供创业项目咨询等。在我看来，两岸实在有太多可“合”的地方。不管是出于台盟人的工作职责，还是政协委员的履职要求，我将继续围绕着“融合”这条主线，通过各种台胞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帮助他们更加深入大陆社会，了解我们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进一步凝聚共识，让更多在汉台胞和岛内同胞切实感受大陆的蓬勃生机和发展机遇，了解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武汉高质量发展贡献台胞力量。

（唐红漫：九三学社社员）

湖北联中校友万庚育的敦煌情

◇王 立

一辆后挂拖斗的美式吉普车在茫茫戈壁中的沙石公路上颠簸西行。盛夏八月，大漠孤舟，常书鸿所长带着他从中央美术学院请到的李贞伯、万庚育夫妇一家五口，还有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坐在车上，奔赴敦煌文物研究所。

1954 年 8 月，从北京一路西行，经过兰州后，又晓行夜宿 8 天，穿越延绵 1000 多公里的河西走廊，李贞伯、万庚育夫妇带着 3 个年幼的孩子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一来竟是几十年。

一

万庚育出生成长在长江边。她在武昌就读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之后考入汉口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每年暑假，万庚育的祖母带着在城里读书的孙儿孙女们回到黄陂乡下避暑，五通口的万家四进大宅院就会热闹起来。

万家诗书传家，十分重视儿孙的国学修养。暑假里，万家辟出一进院落专做学屋，请来私塾先生教习孙儿孙女。白天，万庚育兄弟姐妹背古文、临字帖；晚饭后，孩子们拿着小板凳到稻场乘凉，围坐在祖母身边，听祖母讲故事。这是万庚育童年和少年时期最快乐的时光。

这样的时光在万庚育 15 岁那年戛然而止。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万庚育参加了全市学生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战事越来越严峻，前方转来的一批批伤兵，住满了武汉大大小小的医院，医护人员奇缺。汉口、武昌各女中高一以上的学生全部分派到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充当临时护士。

万庚育被派到法国教会办的梅神父医院。走进病房，面对那些血肉模糊、痛苦不

就读湖北联中恩施女子高中分校时的万庚育

堪的受伤官兵，她抑制不住悲愤的泪水。一天晚班，医院接收了一位肘部被炸开花、伤口全是脓血的重伤员，整个胳膊肿得可怕。医生诊断是破伤风，但当时医院没有特效药，万庚育眼睁睁地看着这位伤员在黎明前死去。这残酷的一幕在万庚育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深深烙印在她的心头。

二

万庚育的学校与省立一女中、省立宜昌中学女生部合组成湖北联中恩施女子高级中学分校，1938 年秋，万庚育辗转来到湖北联中恩施女子高中分校就读。学校设在恩施城西 60 里的屯堡新街，校舍是当地望族许家为抗战助学腾出的一条刚刚落成尚未开张的商业街。穿街而过的石板路两侧是土木结构上下两层的商铺，街头的大栅栏权做校门，街尾是清江和龙桥河交汇处的一大片开阔河滩。

学生寝室由楼上的仓房改做，一间接一间，抬头便见梁上的椽子和青瓦。房间没装房门，窗户糊着窗纸，房内摆放着 12 张高低木床。万庚育选了一个上铺。她不曾见过这样的房屋，从小到大，从黄陂到武昌，她进进出出都是深宅大院。万庚育爬到上铺，她想起了汉口一女中学生寝室明亮的落地窗、光洁的地板、整齐的储物柜，单人钢丝床、床罩、蚊帐，还有训育员的白手套……艰苦的联中求学生活开始了。

到校的头一餐，刚刚端起饭碗，万庚育她们同桌的 8 个女生一起哭了。哭声霎时引爆了大家压在心底的悲伤，饭厅里几百个女学生哭声一片。看着饭厅四面的半截墙壁和用几根木柱撑起的顶棚，看着饭厅中没有板凳的几十张方桌，万庚育又想起了汉口一女中洁净的餐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让她和同学们失去了昔日的校园，国破家亡，多少人死于炮火、多少人流离失所。战乱中能有这样一个管吃管住管穿的求学之处已属不易，万庚育懂得珍惜，她提醒自己尽快学会适应这里的一切。

这里没有汉口一女中的大礼堂、大教室、大寝室、大饭厅，然而这里依山傍水，大自然的旖旎多姿，抚慰着万庚育她们这些追寻知识和光明的花季少女。落日晨晖中活跃着女孩子们的身影，《黄水谣》《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的歌曲又在校园唱响。

万庚育就读的高二班级有 30 多名学生，教室是铺面改做的，不甚宽敞，前排课桌几乎挨到老师的讲桌。白天不时有敌机空

袭，警报一响，同学们便往附近的山坳里跑，找个大石头缝钻进去，警报解除后再跑回教室上课。晚自习时，20多盏桐油灯冒着黑烟，整个教室笼罩在浓浓的烟气中，她们的鼻孔被熏得黑黑的，连吐出的口水也是黑的。

让万庚育她们崇敬的，是和学生们一起来到这穷乡僻壤的那些学识渊博、执教认真的先生们。万庚育她们班的英文教员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全程以英语授课。而那个被学生们称作“羊胡子”的训育主任，一看到有学生从校门口的栅栏里伸出手去买东西吃，就气喘吁吁地跑过去大声阻止。也难怪，战时缺医少药，这么多学生生起病来怎么得了。

第二年万庚育上高三，学习非常紧张。一天傍晚，万庚育收到表妹来信，始知母亲一年前因脑溢血去世。真是晴天霹雳，万庚育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同学们赶紧围拢来安慰她，不想没有劝住万庚育，反而同万庚育一起哭起来。万庚育彻夜未眠，母亲的音容笑貌一直在眼前闪动，她告诫自己：绝不能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一定要在全省高中毕业会考中考出好成绩，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1940年暑假，万庚育高中毕业了，她的愿望是去重庆报考艺术学院。来恩施两年多，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没有盘缠，于是她就近报考了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园艺系，从屯堡搬到五峰山。

在农专，万庚育参加了学校的谷啸剧社，在《塞上风云》中扮演牧羊女金花儿。该剧在恩施城接连演出了三天，场场观众爆满。著名戏剧家洪深在恩施期间，从恩施的7个剧团中抽调出一批精干演员，联合排演老舍编剧的《残雾》。万庚育被从谷啸剧社抽调到剧组参加演出。经过半个月的排练，1940年11月22日至25日，《残雾》在恩施公余剧场公演，将恩施的戏剧运动推向高潮。

导演洪深认为万庚育是个演剧的好苗子，但是万庚育还是执意报考心仪已久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42年9月，万庚育如愿以偿，走进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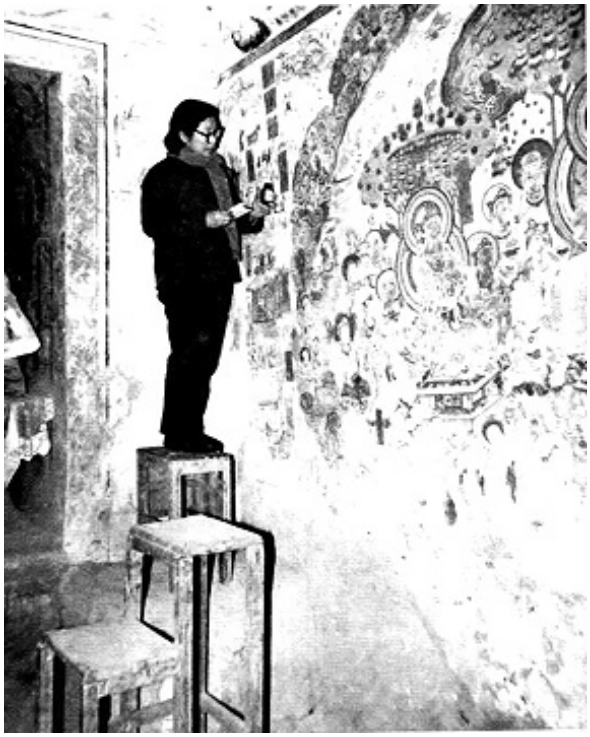
三

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万庚育被分配在西画班。西画班8名学生只有她1名女生，徐悲鸿先生亲自来上课。徐悲鸿教学非常严格，每位学生的每张习作他都亲自指导。主要授课教师还有吕斯百、吴作人、李瑞年、傅抱石、秦宣夫、费成武等，他们多曾留法学习的，对学生的要求也像徐先生那样严格。万庚育和同学们在这些名师的指导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0年代万庚育（左三）与老师徐悲鸿（左一）、师母廖静文（左二）、同事陈玲娟（右一）合影

1946 年 8 月，万庚育大学毕业，适逢徐悲鸿去北平接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邀万庚育前去北平艺专工作。北平艺专的大部分老师是万庚育昔日的老师和同学，大家一见如故，工作起来十分愉快。每逢星期天，徐悲鸿总是邀约大家一起外出游览北平的名胜古迹，每次都是尽兴而归。

在北平艺专，万庚育遇到了才华横溢的青年国画家李贞伯。1948 年 5 月 20 日，万庚育与李贞伯在北平梅神父教堂举行婚礼，徐悲鸿为证婚人。徐悲鸿在一块粉红色软缎上写下“百年好合”四个字，前来参加婚礼的廖静文、吴作人、萧淑芳、李苦禅、宗其香、叶浅予、李瑞年、戴泽等老师，以及同学和亲友纷纷在上面签名，留下永久的纪念。徐悲鸿先生还当场泼墨挥毫，为两位新人画了一幅气势非凡的奔马图。吴作人先生也作画一幅作为贺礼，成为北平美术圈中的一段佳话。



1981 年万庚育在莫高窟第 23 窟

四

见到莫高窟的那一刻，万庚育兴奋极了，历经朝思暮想，终于来到了这座神秘的艺术圣殿！而与艺术圣殿相伴随的是西北大漠陌生且艰辛的生活环境，睡土炕、吃食堂、点油灯、喝河水……然而，万庚育没有退缩。

初来乍到，常书鸿所长没有立即让万庚育进洞窟临摹壁画，而是安排她负责整理所里收藏的藏经洞出土经卷及图书资料。万庚育清楚，这是她走进这座艺术殿堂的极好机会。放在磨坊里的一麻袋经卷残片，是万庚育用盛着开水的搪瓷杯一张一张熨平的；莫高窟 400 多个洞窟的说明牌，是万庚育一笔一画工整写出来的。这一件件细小的事情，为万庚育日后开展壁画临摹和研究考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远离县城的荒漠是孤寂的，不过三危山的山坡上，不时飘荡着万庚育一家 5 口的欢声笑语。周末或假日，万庚育夫妇带着孩子来这里散步玩耍。万庚育坐在山坡上，静静地欣赏着阳光下莫高窟迷人的景色。她的心头为之震颤，她要留住眼前这美轮美奂的莫高窟全景，决定用素描的手法画一幅莫高窟全景图。

万庚育整日面对鸣沙山密如蜂房的 492 个洞窟，终于在 1955 年秋，绘制出 9 米多长的莫高窟全景图。当年，这幅作品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敦煌艺术展，并由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令人痛惜的是，这幅珍贵的全景图在“文革”中丢失了，目前仅存胶卷底片。

1956 年，万庚育在整理、校勘《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时，发现第 428 窟东壁南侧有“晋昌郡沙门比丘庆仙供养”题记，同时

她又在敦煌石窟遗书《大比丘尼羯磨经》卷尾发现“天和四年岁次己丑六月八日写竟，永晕寺尼智宝受持供养比丘庆仙抄讫”题记。天和为北周年号，据此，万庚育推断第428窟应是北周石窟，而不是张大千原定的北魏石窟。常所长得知后十分惊喜，亲自到该洞窟仔细考察，将其艺术风格与其他洞窟做了一番比较，经过严格考证，认可了万庚育的推断。后来在洞窟分期排年时，又从北魏窟中甄定十几个洞窟为北周窟，填补了这个时代新建佛窟的空白。万庚育就此撰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一文。

1954年8月，万庚育赴敦煌途中

万庚育临摹的第一幅壁画，是北周第296窟窟顶藻井四周的忍冬、禽鸟边饰。万庚育结合自己的临摹，撰写了“敦煌艺术小丛书”之一的《敦煌壁画（西夏、元）》。此后几十年间，万庚育临摹了莫高窟、榆林窟、武威天梯山石窟以及陕西懿德太子墓等处壁画，并参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壁画临摹。在敦煌这个艺术宝库中，万庚育满腔热情地为着心中的理想努力工作着。

1966年“文革”到来，万庚育李贞伯夫妇俩遭遇批斗、抄家、挨打。比身体挨打更伤心的是，亲眼看着自己的画稿、画笔和金石名家篆刻的印章等珍贵物品被搜出来毁坏。李贞伯不忍看到自己的心爱之物被玷污糟蹋，含泪将家中所藏的徐悲鸿、吴作人、李瑞年、李苦禅、董希文等恩师的画作卷起来，和小儿子一起抱到屋旁的河坝里一把火全烧了，只设法留下了自己的两幅画作。

“文革”中的那几年，万庚育放羊、喂猪、挖树沟、割麦子，照顾生病的老喇嘛……但却无法照顾被隔离审查的丈夫。一天，有人悄悄告诉万庚育：李贞伯胃出血住院了。万庚育心急如焚，冒着风雪走了50里路赶到县城医院。刚刚走进病房见到丈夫，革委会的电话就追到了医院，命令她立即回去。不得已，万庚育只得连夜赶回莫高窟。茫茫雪夜孤身一人，她摘下头巾握在手中来回挥舞着给自己壮胆。

1972年3月，国家文物局指定万庚育、欧阳琳、关友惠3人，协助陕西省博物馆完成陕西乾陵懿德太子墓的壁画临摹工作，万庚育这才有机会恢复正常工作。这期间，万庚育临摹的懿德太子墓甬道和主墓室的宫女图、仪仗图，1975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汉唐壁画展”赴日本展出，后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1975年，万庚育接受了制作莫高窟档案的任务。她每天早出晚归，带着小板凳、小画板、记录本和手电筒进出洞窟，专心致志地记录着洞窟的每一处细节。如此日复一日，历经整整两年，万庚育完成了380多个洞窟的档案制作。每个石窟的档案，不仅有

文字说明，还配有图表示意。档案上工整的字体、精美的图表、详细准确的表述，记录着万庚育对敦煌石窟的精心呵护。

多年来，万庚育十分注重对所临摹壁画的内容、出处进行研究考证。第 61 窟是个大窟，窟内 33 幅屏风画，附有文字榜题 128 则，大部分已经泯蚀，难以辨认。万庚育将手电筒蒙上一层黑布，借着微弱的亮光，站在三级凳上，像探险者寻找宝藏一样，仔细辨认那些隐隐约约的字痕。依据辨识出来的这 128 则文字题榜，万庚育翻阅了《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修行本起经》等大量经书，考证出屏风画的内容出自《佛本行集经》。接着她又查阅了国内外有关佛传的浮雕、壁画资料，经过仔细考察研究，撰写出《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壁画佛传之研究》一文，参加了 1983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这一年，万庚育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凭着对莫高窟壁画的深入研究，1985 年，万庚育为《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一书中的 200 幅图版撰写了说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对万庚育撰写的说明赞不绝口，称赞她写的说明“一个字也不能加，一个字也不能减。”同时，万庚育还校审了《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彩塑》一书。这两本书获得了全国首届美术图书奖金奖。同年 10 月，万庚育作为“中国敦煌艺术代表团”成员，赴日本东京出席“中国敦煌展”，并赴福冈、静冈、奈良、长崎、京都、大阪等地考察。

五

1990 年，在敦煌辛勤耕耘了 36 载的万庚育退休了。次年，69 岁的万庚育搬到敦煌研究院在兰州新建的家属楼。搬家时，万庚育李贞伯夫妇抚摸着敦煌旧居中的书桌、简易书架、马灯、煤油灯……一件也舍不得放手。这些东西，陪伴着他们全家在莫高窟度过了一万多个日日夜夜。看着这些旧物，他们仿佛还在和莫高窟相守。闲暇间，他们谈论最多的还是莫高窟，那 492 个洞窟中每幅壁画的时代、内容、构图，每尊彩塑的神态、线条、敷色，已经镌刻在他们的脑海中，莫高窟早已融入到他们的生命中。

万庚育放不下手中的画笔，退休后，又临摹了近百幅壁画。2000 年 6 月，为纪念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诞生 100 周年，78 岁的万庚育在兰州大敦煌艺术馆举办《万庚育临摹敦煌壁画展》，前来参观的人流络绎不绝。

2006 年 6 月，《万庚育临摹敦煌壁画选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耄耋艺术家选取 99 幅亲自临摹的敦煌壁画，18 幅人物写生和 1 幅莫高窟全景图，献给她心心念念的祖国，献给她为之倾尽毕生心血的敦煌艺术。

2017 年，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 95 岁的万庚育文艺终身成就奖。多年来，多家报刊、电视台采访报道了万庚育的感人事迹，这位将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视为己任的艺术家，从来没有为自己放弃大都市的生活后悔过。几十年的荒漠坚守，几十年的负重前行，皆因她心中有大爱——爱祖国母亲，爱敦煌艺术，爱民族瑰宝！

2020 年 6 月 24 日，万庚育驾鹤归去，人们不会忘记湖北联中杰出校友万庚育——永远的敦煌艺术家。

（王立：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已退休）

武汉长江二桥工地采访手记

◇ 尹新秋

每次看到武汉长江二桥，都觉得特别亲切。1991 年 8 月，两座主塔墩施工正忙的时候，我到工地，采访了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一处三处和船管处的建桥大军。1995 年 6 月通车到现在，几十年来，无论是春光秋意，朝晖夕阴，还是灯光璀璨，月圆花好，桥身塔影都会叠映出桥工们的风采。

封底，抢在洪峰之前

同长江打交道，这是第 11 次。这次，桥工们却肩负了与以往不同的使命。

这是一座主跨 400 米的钢筋混凝土双塔斜拉桥。造这样的桥，大桥局是第一次，全国是第一次，亚洲也是第一次。它与西班牙同类型的、有“世界第一桥”之称的卢拉巴里奥斯大桥的主跨仅差 23 米。11、12 号主塔墩，位于主航道两侧水深 20 多米的主河槽中。从水深来看，它是世界第一。长江的深水区，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的水位变化十多米。要确保桥墩精确定位，必须确保钢围堰不移位。而洪峰的冲击，会带来移位的危险。桥工们没有选择，只能抢在洪峰到来前封底！

这是武汉的长江，它要在“火炉”里流淌。照说，我们可以省略对酷热的描写。因为武汉人都知道那种滋味，特别是在热得彻夜难眠的时候，在抱怨电扇只吹热风的时候，在喝冷饮也冒汗的时候。但建桥工地的气温，不能以气象预报为准，也不能参考平时的体感经验。只要在铁驳或施工平台一站，不到半分钟，就保管你烫得受不了。而桥工们大部分时间就待在铁驳或施工平台。钢围堰里的气温更是高达 50 多摄氏度。

双壁钢围堰双壁之间仅仅一米多，似乎是专为电焊工留下的容身之地。头顶是毒

花花的太阳，四周是晒烫了的钢板，面前是电焊的弧光，还得头盔面罩厚厚的手套和工作服“全副武装”。不说亲身体验，只要把这情景想一想都可能全身冒汗。

北岸指挥所的戴金海告诉我，报社一名记者在直径 20 多米的钢围堰里（不是电焊工经常要站的双壁之间）拍了一个高温作业的镜头，就浑身不见一根干纱。“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这类常用语，这里用不上。因为衣服湿了，就没机会再干。一个钢围堰仅单面的电焊缝就长达 9 万米，电焊工要湿多少套衣服呢?

主塔基础施工，在软硬不均的胶结砾石地基中，采用直径 2.5 米深水钻孔桩技术，嵌入岩层深达 27 米。钢围堰的里里外外，都在同时间赛跑。

共产党员曹友林年届半百，高烧 39 摄氏度，坚持不下火线。

宗汉渝患病在家，听说封底，执意赶到工地。

毛江豫爱人千里迢迢从河南赶来探亲，同时也带来一个看看武汉风景名胜的愿望，她是第一次来武汉。领导劝毛江豫陪妻子出去玩玩，至少逛一次黄鹤楼。夫妻一年到头难得有几天相聚的日子，他何尝不想陪妻子逛逛。但这是封底的关键时刻，他只有求妻子谅解。

共产党员王令欣，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孩子摔断了腿，急需他回家求医问药。没有哪个父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没有哪个父亲不为孩子的伤痛而忧心如焚，王令欣却把电报往兜里一揣，硬是干到封底完工才请假登程。

这样的事例无法一一举完，事实上每个桥工都该大书一笔。人手不够，三班倒改为两班倒，一干就是 12 小时。饿了，随手拍拍手上的泥灰，啃一个馒头，喝一碗菜汤；衣服汗湿了，没时间拧一把汗水，更顾不得蚊虫叮咬满身泥浆。封底，历来都是马不停蹄、硬拼实抢、争分夺秒。

这样的施工规模，在我国桥梁基础施工中绝无仅有，这样的施工速度在桥梁史上也是罕见：只用了 57 小时，2200 立方米混凝土就倾注江底，确保了钢围堰安全度洪。

后来，武汉长江二桥连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班奖和多项工程质量奖，20 多项主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桥工们抢的是时间，抢的是进度，同时抢的也是质量。

人机会战，那些技术参数，技术指标，施工环节，操作规程，说起来很枯燥；保质保量，精益求精的事迹和经验，很多媒体都做过报道。这里只讲一个人与机器的故事。

吊机班班长余方德，是优秀共产党员。采访前，指挥部杨润汉给过我一份简讯，知道他在吊车操作上是怎样娴熟自如，维护上又如何经意经心。到工地后，又听工友们说了一个“笑话”：封底前夜，余方德给吊机紧一个螺丝。由于用力过猛，扳手脱落，身体失控，一头撞上吊机。余方德先摸吊机，再去摸自己头上的包。旁人笑他：“脑袋怎么撞得赢吊机？”他才如梦初醒，憨憨一笑。

面对狂风恶浪

1991 年 3 月 20 日下午 3 时许，大桥 8 号轮拖着刚摘下吊钩的大桥 14 号吊船，正准备驶向安全水域，突然大雨倾盆，江面搅起 7 级大风。26 毫米粗的头缆在巨浪的拖拉扯拽中嘎然绷断。失去控制的吊船在波峰浪谷间东倒西歪，突然卸去负担的 8 号轮也猛然摇晃起来。

险情就是命令！

只见刘友喜、赵宋祥、吴保国从8号轮首冲到船尾，从舱内拖出50毫米的太平缆向吊船抛去。

一次，二次，三次……

可惜次次都功败垂成！

除了瞅机会跳上吊船迅速抛缆别无选择。这当然是极危险的选择，一脚踏空，就有葬身鱼腹的危险。

就在巨浪把两条船抛得挨近的一刹那，刘友喜、赵宋祥“唰”地一个飞跃，跳上14号吊船，直扑锚机……8号轮船长文茂庆抓住机会，迅速靠拢。“头缆完毕！”“操纵缆完毕！”随着一声声复令，桥工又奏响了一曲战风斗浪的凯歌。

陈才道获得过全路“火车头奖章”，是铁道部劳动模范、大桥局优秀共产党员。我想象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大汉，在徐家棚工地见到他时，才知道他身材瘦小，体重不足50公斤。这瘦瘦精精的陈才道，却是一位能战飓风能斗恶浪的硬汉。

3月22日下午，风雨骤起，江面巨浪壁立，处于主航道一侧的12号主塔墩墩位上的导向船，在惊涛中剧烈颠簸，锚缆被刮得“呼呼”作响。钢围堰阻水形成的浪花，冲腾跳荡盖过围堰，围堰与铁驳的间隙，激流呼啸，惊心动魄。万一锚缆吹断，围堰倾斜，后果不堪设想。

南岸指挥部笼罩着紧张气氛。陈才道受命于危难之际，得带领伙伴负责围堰的安全。

半夜时分，风力增大到10级以上。陈才道瘦小的身子被大风刮得如同一片飘转无定的树叶。他拼命抓住护栏，围绕着钢围堰一遍遍查看，注意锚链的松紧。一夜惊涛，一夜无眠。到第二天清晨，风势减弱，他才拖着一身疲惫上岸。

“有啥子写的？抢险嘛，大家都一样。”陈才道的四川口音，带出巴山蜀水的凝重与淳朴。他一下就岔到了大伙抢险的话题。

洪水说来就来。7月上旬一连10多天暴雨，洪水一下就舔到了机械库。陈才道和10几名桥工用万能杆件在水中拼出铁架，抬高机器马达。只几天时间，就拼杆件100多吨，抬高机器马达70多台，也是100多吨！

桥工们谈抢险，都习惯于轻描淡写。许多惊险场面，玩命时刻，都成了平静的回忆，连同回忆后的淡然一笑。

架桥嘛，本来就是向洪水惊涛要路。

水上食堂与单身宿舍

炊烟袅袅，南北相望。炊烟下面，是桥工的食堂；食堂下面，是长江的波涛。

水上建食堂，是桥工们的发明创造。这是几十年的冷菜冷饭憋出来的。以前是把饭菜送上桥墩。每当秋冷冬寒，北风呼啸，雨雪霏霏，饭菜冰凉，有时馒头成了“砖头”。

武汉长江二桥

虽然水上食堂只有简简单单三四个菜，吃饭无遮无拦，仍是风餐野韵，但桥工们很满足。船是有些晃，他们习惯了，不会像我一样去做“漂泊”的联想。

走进一处的单身宿舍，一眼就看到床边的木箱。一人两口，规格统一，一律是钢梁颜色，也有钢梁一般的结实，像在叙述桥工那些走南闯北的流动岁月。

一张床，两个木头箱子，加一个略带点现代气息的床头柜，就是单身桥工的全部家当。党总支书记徐安国一再说，在武汉造桥，条件是最好的。以前住油毛毡工棚，住板房，睡地铺。这一排排“最好”的简易平房，砖木结构，和以前相比，确实是“鸟枪换炮”。但看看周围的高楼大厦，觉得它们还是太简陋了。

“江河多，水流长，遇水我就架桥梁。”

为江河架桥的桥工，80% 以上是牛郎织女，银河迢递，天各一方。他们难得享受天伦之乐，大部分时间给了那首流传极广的顺口溜：“一条铁路长又长，有女不嫁铁路郎。一年 12 天探亲假，30 年正好同一年床。”

礼拜天节假日不属于桥工。当人们流连公园，漫步湖畔，登高揽胜，或是在电影院歌舞厅怡然自醉的时候，我们的桥工正在栉风沐雨，或是战洪水战高温。没人号召，没人动员，更没人强迫，他们自愿。为的是两天抵一天探亲假，一年能多 20 几个团圆的日子。

家里老人要照顾，孩子要操心，爱人忙里忙外，也该帮一帮手。家在农村，还得赶回去割小麦，忙“双抢”……

“对小家哪能不关心呢？”二分队刘书记是个实话实说的人。“但大家需要的时候，只有舍了小家保大家。几十年东跑西溜，单位为家，也就惯了。”

罗马尼亚一个桥梁考察团，在二桥工地考察了几天，连连摇头：“太艰苦！太艰苦！”他们断言，罗马尼亚不可能建立这样一支能吃苦耐劳的桥梁队伍。

如果想找出背后的精神力量，深化一下报道的主题，你一定会失望。他们顶多说是“爱岗敬业”。吃苦耐劳，攻坚克难，抢工抢险，成了生活日常，就没人去探究它特别的意义。桥工们最爱说的是修了些什么桥：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长东黄河大桥…… 数说一座座大桥的时候，一脸自豪与幸福。尽管因为主攻水面正桥，他们等不到大桥竣工，就奔赴了下一个工地。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修建的大桥上看一看，走一走。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二桥，他们也等不到“天堑变通途”。

现在，我想对他们说，长江二桥已成武汉一景：中部双塔，凌空挺秀，扇形挂缆，如挂云帆。它与武汉长江大桥遥遥相望，同蛇山的黄鹤楼、龟山的电视塔相得益彰。江滩“靓”起来了，它是最好的背景。市民游客，不知拍下它多少“高光时刻”。灯光“秀”起来了，它是最好的舞台。魅力四射，光耀江城。

我想对他们说，武汉长江大桥不再拥堵，“武汉交通一线牵”已成历史。长江二桥把两江三镇环起来，车水马龙一经循环，就少了滞碍。也正因如此，看到长江二桥，我常常想起建桥工地，特别是那些单身宿舍。总希望这个“环”，是那些“单身”桥工团圆的象征。

（尹新秋：武汉电视台高级编辑、海外专题部主任，已退休）

“新升隆”轮事件中遇难的五位湖北籍烈士

◇ 王文宾

1938 年 10 月 23 日，新华日报馆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部分同志及家眷、朋友、难民等人员，乘“新升隆”号轮船沿长江西撤重庆途中，在湖北嘉鱼县燕子窝（今属洪湖市燕窝镇）附近遭到日机轰炸。

“新升隆”轮不幸沉入江底，造成重大伤亡，死伤近百人，其中新华日报馆牺牲 16 人，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牺牲 7 人，幸存人员在李克农、潘梓年的带领下分批撤往长沙、重庆等地，史称“新升隆”轮事件。这在中共党史尤其是新华日报史上，是一次惨痛的历史记忆，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一笔血债。

这一年的 12 月 5 日，为了悼念死难烈士，新华日报馆在重庆演武厅社交会堂举行庄严隆重的追悼大会，重庆各界人士四五千人参加，毛泽东、朱德和林森、陈立夫等国共高层送来挽联和花圈，董必武、吴玉章、沈钧儒、绿川英子等十多人到会并讲话。当天的新华日报出版《追悼本报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特刊，会后还编印了《新升隆轮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纪念册》。

2021 年，时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武汉这座英雄之城，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有太多的英烈值得铭记缅怀；而与此同时，一些革命英烈的事迹还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宣扬，甚至鲜为人知。在“新升隆”轮事件中，新华日报馆遇难的 16 位烈士中，就有 5 位是湖北籍，他们是印刷部工作人员李鉴秋，编辑部工作人员胡宗祥，营业部工作人员徐厚银、易竞成、李元清。年龄最大的李鉴秋 28 岁，最小的李元清只有 14 岁。

为了宣扬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题材，笔者通过查阅当年《新华日报》相关报道、《新升隆轮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纪念册》以及亲历者、亲友、同仁的回忆史料等，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武汉分会等编印的《新升隆轮遇难五十周年纪念专辑》

新华日报在重庆为遇难烈士开追悼会

（1988 年内部发行）烈士小传的基础上，对 5 位湖北籍烈士的生平事迹进一步挖掘完善，以示纪念。

排字房领班李鉴秋

李鉴秋，湖北汉口人，遇难时年仅 28 岁。

在大革命时期，李鉴秋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南京青年印刷所任领班。南京陷落前返汉，因父亲去世家庭生活困难，经人介绍进入新华日报工作，在印刷部任排字房工人，后担任排字房领班，为人心直口快，喜欢结交朋友。

为了每日报纸“争取七点钟出版”，他作为领班身先士卒，战斗在印刷第一线。他曾对林肖硖（新华日报馆总务科负责人）说：“要使报出的早，我们排字房的工友，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我们要督促编辑部工作同志提前截稿时间，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排字房的同志要把提早出版看成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和当做自己的事一样地做，才能做得好，才能达到七点钟出版的目的。”（见林肖硖《模范工人——李鉴秋同志》）排字房在他的带领及熟练操作下，达到了报纸“每日七时出版”。在临近从武汉撤退的最后那段时间，虽然报馆工作人员减少了，但排字房还能保证不超过七点钟出版时间，在六点半甚至五点五十分出版。正如林肖硖所说：“李鉴秋同志是用了他极大的精力，尽了最后的努力……”

排字房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李鉴秋到报馆后的显著变化是分不开的。同事汤宝桐在悼念文章《悼四个英勇的工友同志》中，特意提到了李鉴秋到报馆工作后的变化和感受：“他对工作的兴趣和积极性是与过去完全不同，每每在谈话当中他清楚地了解过去工作与现在的不同，赞扬着新华日报馆做事的民主化，上下不分等级亲爱如家人，没有官僚腐化的恶习存在，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准，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克服了一切的困难问题，学习了共产党和八路军艰苦的作风，锻炼出了坚强的信心。”另外，作为一名干部，他敢于铁面无私批评一些不负责任的现象，与那种浪费公家材料的行为作斗争。

取稿员胡宗祥

胡宗祥，湖北黄陂人，遇难时年仅 25 岁。

胡宗祥 1938 年 2 月进入汉口新华日报馆工作，在编辑部任取稿员，同事们都亲切地称他“小胡”。

初进报馆，胡宗祥还是带点市侩气的社会青年，喜欢穿戴但又不讲究，常常是一件黑色对襟中式短衫，外套一件西装。在报馆严肃紧张的环境下，他渐渐发生变化，不仅有了自觉学习的要求，还提高了责任心。

他性格豪爽直率，爱嬉笑不拘束，但具有“积极工作的精神”“晚间取稿来回毫无停滞”。他最要好的朋友、在中央通讯社传达室做收发工作的王刚，在《悼胡宗祥》中讲到，他是一个热血爱国的青年，武汉开展献金救国运动中捐献了5元以上的法币。同时，还“恳切的劝别人节约献金”。有一次，他从别人那里借来3元钱买衣服，当碰到街头话剧宣传献金救国时，主动献上2元。据王刚回忆：“他时常对我说前方将士是何等为我们英勇流血，我们后方应当怎样慰劳他们，增强我们的抗战力量，这使我感到异常钦佩。”

来新华日报后，胡宗祥有了明显的进步。同事姚庭宾（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在追悼文章《记三位勇士》中写道：“他八个月的工作，一贯精神都是使人高兴。到了武汉危急，报纸的任务更大了，他对工作的自觉性更增高了，这说明，报馆克服了他的弱点，发扬了他的特性。他的殉难，可说是报馆损失了一个有希望的干部，国家失去了一个勇士。”

在敌机轰炸“新升隆”轮时，他临危不惧，危机关头还关心全船人员安危和物品，高喊“怎么办？”

三位小烈士

许厚银，湖北武汉人，遇难时年仅15岁。

许厚银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父亲是银行小职员。他原在上海新闻报汉口分馆当练习生，听说共产党在汉口创办了新华日报，就请父亲托人介绍到新华日报工作。

对于为何离开新闻报而来新华日报工作，他是这样回答的：“听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办的，共产党待人很好。我的书读的很少，听说这里还可以读书，我怎么不跑到这里来呢？”

许厚银负责管理票签（发行）工作，起先还有个小插曲。营业部主任易吉光找他谈话，让他负责此项工作，他也答应了。但后来考虑管理票签项非常麻烦而又十分重要，稍有差错就可能使读者见不到第二天的报纸，怕一个小孩子应付不过来，就换了另一位同志负责。他听说后，回家大哭了一场，并要求父亲和哥哥到馆里请求试做两天，若不能胜任，再安排别的同志。馆里接受了他的要求，并对他安慰和鼓励，同时给予帮助。从此他就担负起这项繁重工作，认真负责，有条有理，一点也没弄错。

易竞成，湖北人，遇难时年仅15岁。

易竞成圆脸，身体健壮，有点口吃。读过两年学，13岁就在汉口一家纱厂做童工，父亲和兄嫂也是纱厂的职工。在保卫大武汉的危急时刻，因纱厂迁往内地，全家失业。经其舅父罗广耀（新华日报馆总务科工作人员，也在此次“新升隆”轮事件中遇难）介绍，到新华日报社做练习生。平日里埋头做事，下班后喜欢看报学习。

有一次，易吉光见他下班后一人在床上读当天的新华日报，就问他“你看的懂吗？”他回复：“有些看不懂。”“看不懂你怎么办呢？”他答复：“现在好多了，因为进了新华日报有读书班，帮助我们看报写字。要是从前在纱厂，厂里不准看报，工头看到了，要打人呢！”通过不断学习，他在识字方面和抗战知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李元清，湖北武昌人，遇难时年仅14岁。

李元清身体瘦弱，头脑灵活，原是一名小报童。新华日报成立不久，他独自一人找到易吉光，要求到报馆工作，并表示无

新华日报上刊发的纪念版画

论干什么都可以，只求有饭吃。易吉光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卖报为的找饭吃，到报馆工作，也只要有饭吃就够了，卖报要受报贩头的压迫与剥削，到你们共产党的报馆来工作，不受剥削与压迫，还要做抗日的工作，我还要求什么呢？"易吉光见他意志坚定，说话也伶俐，就让他做了练习生。

有一次，报社机器出了毛病，必须夜里赶印报纸，三个孩子主动来做夜工。其间，许厚银开玩笑不小心推了李元清，李元清倒在了玻璃门上，伤了胳膊，血流不止，报馆立即送他到医院。但第二天一早，他吊着膀子仍来参与卷报。易吉光发现后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昨天机器坏了，报还没卷完……堆集这么多，九点钟还要赶火车，我不帮忙，他们怎么做得了呢？"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责任心。

在报馆，三人积极要求进步，业余学习文化知识。每天一吃过晚饭，就会催促报馆的送报员和勤务员给他们上课。他们"在两点钟的上课时间内，绝不放松一分钟"。在谈论会、生活检讨会、时事座谈会上，他们懂的就讲，不懂的就问。对于唱歌，他们也特别感兴趣，每晚临睡前，都会自发唱歌。李元清虽然最小，但文化水平最高。在武汉各界慰劳前线抗敌将士委员会发起的征求三十万封慰问信活动中，他每天会写三封慰劳前线将士的信，而且写得还不错。

"孩子是抗战建国的继承者，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主人。这是本报全体同志对于孩子们的态度和认识，也是我们的施教方针。"（易吉光《悼我们三位小英雄》）对于包括这三位在内的十几岁的孩子，新华日报给予了特别关怀。考虑到他们还在长身体阶段，特意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关心他们的日常饮食营养。同时，加强教育引导，给予读书习字游戏的时间。由此，他们识字更多了，字写得更好了，常识增加了，身体也健壮了。新华日报管理委员会曾公布一项决议"不断选拔优秀工作人员，由报馆资送陕北学习"，更增强了他们的学习热情，积极争取前往陕北学习的资格。

在此次"新升隆"轮事件中，三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易吉光在《悼我们三位小英雄》一文的结尾说："可敬爱的小英雄们！你们以自己的鲜血，结束了你们光荣任务，中国千百万的小孩和青年们，将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安息啊，孩子们！静听中华民族解放的凯歌！"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称赞他们是抗战的小英雄，是少年的先锋队。

（王文宾：武汉博物馆文博馆员）

摩崖石刻见证武汉古代厚重历史

◇ 万建辉　宋 贝　张 剑

2020 年底至 2021 年初，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武汉地区 8 处摩崖石刻和 1 处石窟寺进行专项调查，于 2021 年 6 月结题。调查报告显示，这些摩崖石刻分别形成于南宋、元、明、清，为武汉留下难得的近代以前的历史遗存。

2021 年 8 月，笔者作为长江日报记者和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现场踏访了其中 4 处摩崖石刻。这 4 处摩崖石刻文物价值很高，隐含有丰富的历史故事。

摩崖石刻和石窟寺是我国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体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和文化精神。2020 年，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先后发文，要求加强保护利用摩崖石刻和石窟寺并开展专项调查。根据湖北省文旅厅的部署，武汉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专项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汉阳区凤凰山摩崖、大别山摩崖、梅子山摩崖，武昌区洪山摩崖，东湖高新区九峰山摩崖，新洲区大河冲彼岸摩崖、横河崖摩崖，黄陂区云雾山观音崖摩崖和江夏区白云洞石窟寺。其中，凤凰山摩崖、洪山摩崖刻于南宋，云雾山观音摩崖刻于元代，九峰山摩崖刻于明代，白云洞石窟中的石刻多刻于明代和清代。

8 处摩崖石刻的内容，分别与军事活动、佛教活动相关。如洪山摩崖石刻为南宋驻军鄂州（武昌）的将领赵淳所刻。新洲区两处摩崖石刻内容为“阿弥陀佛”和“彼岸”，是当地佛教传播的体现。九峰山摩崖所处的正觉寺已经毁了，但石刻能完整保留下来，是古代武汉地区佛教发展的有力见证。白云洞石窟寺与唐贞观年间骆禅大师在八分山下“白云洞”建成一石窟寺有关。

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许志斌说：“武汉地区的摩崖石刻如一条条记录历史的短信，囊括了宗教、历史、文学、书法、艺术、

白云洞石刻

社会形态等诸多方面内容，这其中每一领域都值得后人继续探索与研究，深入体味这份先人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

“梅岩”石刻，见证汉阳凤凰山曾是唐宋以来的地标性名胜

在武汉，人们一般熟知龟山、蛇山，少有人知道汉阳凤凰山，更少有人知道位于凤凰山南坡的“梅岩”摩崖石刻。然而，正是这处石刻证实了早在宋代，凤凰山已是文人墨客登临游览的胜地，可与长江对岸唐朝诗人崔颢题诗黄鹤楼所在的蛇山相媲美。

1. 由竖刻题记“端平丙申”推断“梅岩”，刻于 1236 年

过汉阳钟家村十字路口往南几百米，在汉阳莲花湖西南侧阳新路的梅岩村，由城市建筑环绕的一处南坡岩面，看到了褐色岩石上的繁体阴刻“梅岩”二字，字体雄厚俊逸，每字约一米见方。

“梅岩”右下角由上至下竖刻“端平丙申”，字迹紧凑。“梅岩”左下角由上至下竖刻“汉阳令赵时题”。由两侧题记可知，“梅岩”刻于南宋端平三年（1236 年），由当时汉阳令赵时题写。

史料显示，凤凰山原名凤栖山，清嘉庆《汉阳县志》记载：“凤栖山在府治后，因山为城。宋知军（宋代官名）刘辟疆记曰：古有凤凰栖于此，故名。”辛亥革命后，凤栖山才改名为凤凰山。

除“梅岩”石刻外，笔者还看到“梅岩”东侧约一米处后人添刻的“凤立”二字，“凤立”石刻大小和“梅岩”相当。“凤立”二字东约两米又有添刻“立”字。

在“梅岩”西侧约 5 米处，岩体上有一处较小的石刻文字：“□□丙申和亭主人□重铸”。市文考所工作人员介绍，这是 2018 年开展凤凰山摩崖保护展示修缮工程和 2020 年 12 月凤凰山摩崖墙体修复工程时新发现的，这表明后世添刻者和住在凤凰山的主人一起添刻并刻下落款，但“重铸”内容、位置还不得而知，有可能已经损毁。

2. 安南（越南）王定居“梅岩”半个世纪，直至终老

汉阳档案馆馆长钟贤超告诉笔者，历经宋、元、明、清，凤栖山一直是著名风景名胜之地。山上曾建有大小亭台楼阁 10 余座，诸如秋兴亭、双松亭、吸江亭、涌月亭、荷花亭、寥廓台、先春楼、熙春楼、五美楼、水明楼、东山飘然楼、三山阁、凤栖阁等。登临这些亭台，长江、汉水尽收眼底，众多文人雅士登山赏景，吟诗作赋。

其中著名的秋兴亭，明代官修的地理志书《寰宇通志》记载：“秋兴亭，在凤栖山巅。唐刺史贾载建，中书舍人贾至作记。”明永乐十四年（1416 年）此亭遭雷电击毁。

建在秋兴亭东的寥廓台，宋知军蔡继

臣重修后改名为仁风台，并在其所撰《寥廓台记》中载：“据凤栖之峻峰，倚大别（龟山）之巨麓，蜀江（长江）西来，汉水东入，水光山色，四环交映。”

凤凰山曾由“梅岩”直接指代。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安南（今越南）王陈益稷受元朝朝廷调派，在凤凰山置安南国王府，自称“梅岩叟”。

这位安南王身世传奇，后半辈子定居“梅岩”，直至终老。陈益稷是安南陈朝开国皇帝陈太宗宠爱的儿子，元朝进军安南，陈朝坚决抵抗，陈益稷却向忽必烈的儿子镇南王脱欢投降。元朝第二次征讨安南，试图拥立陈益稷为“安南国王”，但被陈朝击败。在元朝第三次进攻失败后，陈益稷被元朝迁往湖广行省的鄂州（武昌），成为该省的平章，在汉阳梅岩建安南王府度过余生50年。

此后安南陈朝派出使节出使元朝，经过汉阳凤栖山安南国王府，使节因陈益稷的投降行为不向他行礼；安南后世史书谴责他为叛徒，称他为“妒陈”，意为“姓陈的女人”。

唐宋以来，汉阳县衙、府衙多建于凤凰山前，凤凰山相当于这些官署的后山。2007年出版的《汉阳区志》记载，宋代以来，凤凰山上先后所建的各种古建筑，今均不存：明初王秩在安南王府遗址上建王太常故宅；明末萧方伯又就其故宅改建私人宅园，明崇祯末被战火毁；清康熙年间副宪（清代都察院副长官左副都御史的别称）江蘩组回乡，又就萧园故址，选吸江亭遗址，建御书楼，并改为私宅。直到20世纪50年代，凤凰山还建有多栋别墅，作为参加长江大桥建设的苏联专家的住宅。

汉阳凤凰山“梅岩”摩崖石刻

南宋将领赵淳留下“洪山摩崖八景”，曾拼死抗金保卫襄阳

洪山摩崖和它所在的洪山宝通寺、洪山宝塔，历史底蕴深厚，历经千年一直是著名的风景名胜，是武汉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沿山间小道，可先后看到“东岩”“东山赋”“云扃”“翠屏”“狮子峰”等石刻。

1.“东山赋”解释在洪山建亭、刻石缘由

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荆南参军赵淳在洪山（时称东山）建东岩阁，将其所写《东山赋》《东岩阁记》刻于山石之上，同时就山上各处的天然形态和色彩纹理稍施斧凿，依其形状，分别命名为“云根”“云扃”“伏仙”“飞雪”“栖霞”“清肃”“半霄”“爽垲”“巉岩”“翠屏”“堆云”“狮子峰”等，用隶书、楷书将它们镌刻于石上，留下“洪山摩崖八景”。

如今，游客很容易找到“东岩”“寿泉”“东山赋”“云扃”“栖霞岩”“清肃”“翠屏”“狮子峰”等八处石刻，它们散布于绿树成荫的洪山南坡。

这些石刻多涂了红漆较好辨认，但像“东山赋”等小字石刻没有涂漆，

石面不平整，加上风化严重，已很难辨认。“寿泉”石刻是洪山摩崖中最大的石刻。“寿”字为隶书，长66.5厘米，宽约50厘米，下方有小字题跋，能辨识20多字。“泉”字为篆书，大小和“寿”字相当，为后人补刻。

洪山“寿泉”石刻

在清代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湖北金石志》中，记载小字题跋原文：“有士大夫政和甲午岁游岳，见五华洞石壁上有寿字，体法不凡，人莫能识，乃以千钱募工得纸本以归。因刻石以传世，新定赵史君茂嘉复模于郡斋，淳偶得之，不敢藏于家，刊诸东岩石上，期与好事者共之，庆元初年乙卯岁中秋日，河阳赵淳谨跋。”

题跋记叙了北宋1114年，有人将衡山一体法独特的“寿”字制成拓本，后来赵淳偶然获得，又于南宋时的1195年八月中秋临摹刻此石。

“东山赋”石刻完整文本，解释了在东山（洪山）建亭、刻石的缘由：当年洪山山林繁茂，但被砍伐也多，驻此地的军营禁止砍伐后，树木长得粗壮。赵淳在南坡就地取木材建东岩阁，为附近各种形状的山石取名刻下。洪山与蛇山一脉相连，东岩阁景观与黄鹄亭景观连成一片，赵淳希望后人不要损毁景观，破坏已形成的景区格局。

2. 以万余宋军抗击二十万金军

赵淳何许人也？在武昌（南宋称鄂州）任荆南参军时为何爱好金石、风月？他留下的洪山摩崖为何没有抗金爱国的文字？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曦教授说，按宋朝官制，“荆南参军”应在荆南府，荆南府后改名江陵府，赵淳可能是这个时候从江陵来到鄂州。他推荐了河南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萧鲁阳论文《襄樊市郊南宋摩崖石刻人物考释》，其中重点介绍了赵淳的生平事迹。

赵淳祖籍河阳，今河南孟县。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河阳之役，除赵淳父亲幸免外，祖父及全家被金军所杀。赵淳与金人既有国仇，又有家恨。

在今襄阳南郊郑家山，有一处摩崖石刻，全文为：“庆元己未寒食日，率兵将官以下，遍祭战将歿土于岩亭之野，酹酒焚币，成礼而去，清明复携家来此，遥睇松楸，用修时祀，河阳赵淳题。”

该石刻由赵淳刻于南宋庆元己未年（1199年）。此时赵淳已从武昌调到襄阳，成为领兵将领。石刻记载清明前后他率军祭奠阵亡将士，这些将士可能死于与金人、蒙古人的小规模战斗中。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在宰相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不到一年就受挫的背景下，金军分九路反攻南宋，以优势兵力围攻襄阳。此时任京西北路招抚使、荆鄂都统制（当地驻军最高指挥官）的赵淳坚守襄阳三个月，以万余宋军抵抗二十万金军。

“（金军）屯兵襄阳城下，围城三月，大战一十二场，水陆攻劫三十四次，九设攻城之机变，为赵淳九拒之，不克而去。”

赵淳幕僚赵万年后来著《襄阳守城录》记载，金兵至樊城，三路人马驰骋江上，襄阳城内，吏民警骇之时，赵淳对他的弟弟赵朏说：“吾家世受国恩，先祖帅河阳，举家为虏所杀，独吾父得免。吾今帅襄阳，值虏入寇，当誓死报国。”

3. 拼死保卫襄阳反被诬指，忧郁而终

襄阳保卫战后，赵淳被任命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接着韩侂胄与金人和谈不成，作继续对金用兵准备，欲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南宋官职），令他速到杭州赴任，正好遇上辛弃疾病死，于是调赵淳赴任“江淮制置使”，表现对金强硬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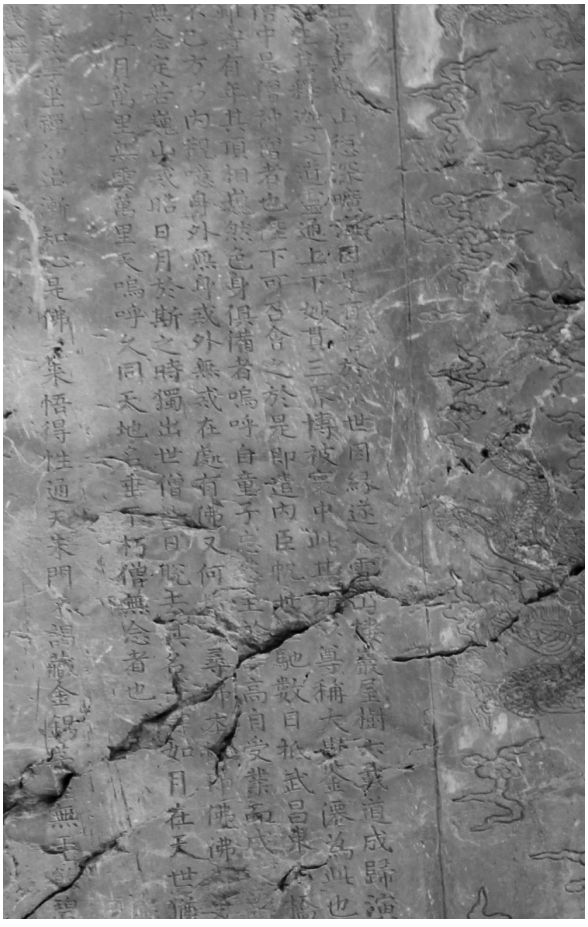
随着主和派首领史弥远指使人杀掉韩侂胄，送韩侂胄人头给金朝，宋金再度议和。朝廷随后任命丘崇为江淮制置大使，作为赵淳的上司。赵淳很快被罢京西北路招抚使职位。赵淳的最终结局，《两朝纲目备要》有记载：“武安军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挥使赵淳已病，是月十二日以忧死。”

湖北大学历史学院曾育荣教授告诉笔者，《宋史》没有为赵淳列传，但在《宋史·宁宗纪》提到一句：“开禧三年六月，赏守襄阳之功。”这说明在襄阳保卫战后，朝廷对赵淳保卫襄阳持肯定态度。但后世的众多官方和民间文献，都不提赵淳保卫襄阳有功，反而不停诬指赵淳火烧樊城、弃城而遁，忧病之中让将士自守等。

曾育荣教授分析，作为主战派的韩侂胄当权时为岳飞平反，压制主和派，打击理学，被杀后主和派自然要“拉黑”主战派人士，赵淳当然也不能幸免。而赵淳在洪山南坡刻下的石刻为何不提抗金，曾育荣认为，或因当年是庆历元年（1195 年），离“开禧北伐”宋金开启战事的 1206 年，相隔 11 年；赵淳在武昌任职荆南参军，相当于军事参谋、秘书之类的闲职，尚未担任军队要职且还年轻，有文人游历山水、爱好金石的雅趣，不足为奇。

朱元璋亲赐无念禅师诗文，刻石留存武汉九峰山

自唐代以来，武昌南郊九峰山就以其群峰巍峨、风景秀美，被视为风水宝地。明初九峰山狮子岩下修筑了规模宏大的正觉寺，岩上刻有“御制谕僧无念”文和五首诗文。如今，正觉寺已不存，原址建了九峰山



九峰山摩崖石刻

革命烈士陵园，石刻仍保存于陵园岩壁之上，有助于揭开明初洪武年间无念禅师的神秘身世。

1. 石刻文字和石刻像均为无念禅师弟子所刻

岩壁位于陵园中心位置，“御制谕僧无念”在岩壁右侧，以小楷写成，全文930字，已剥落30余字，记述了朱元璋召见无念禅师的经过，刻字周围镌刻有九龙腾跃、祥云漫卷图案。五首诗文，为朱元璋召见无念禅师后所赐。

九峰山僧人素描石刻像

石刻左边岩体上刻有一名僧人素描石刻像。僧人脚著草履，正襟端坐于石座之上，目视前方，神志安详。石刻像左上方刻一诗云：“空有空无得正因，其中妙用是源真。本师住世无人敬，现灭应须假幻身。”这位僧人便是无念禅师。

史料显示，洪武三十年（1397年），无念禅师徒弟胜学在九峰山狮子峰前石崖上开龛（龛，供奉神位、佛像等的小阁子），将朱元璋所赐诗文刻于其上。龛高1.6米，宽0.97米，龛额用刻篆书“御制”二字，记述朱元璋召见无念经过，并刻诗五首:《题僧无念九岁出家》《舟归武昌》《武昌归隐》《怀僧无念物赐松实诗》《赐僧无念诗》。

无念禅师于永乐三年(1405年)圆寂后，弟子又在龛左侧刻无念像。像左上方题七言四句偈语，右上方刻“武昌九峰山无念禅师画像”字样。

2. 楚王朱桢向朱元璋推荐无念禅师

930字“御制谕僧无念”石刻文记载，无念禅师9岁出家，拜无极和尚为师，后东游姑苏，从学万峰蔚禅师。归隐宝林寺后，遭遇朱元璋、陈友谅大战，寺庙损毁，无念禅师一人坚守荒墟数年。朱元璋一统天下后，兴文化，僧众云集，宝林寺重建。

洪武十五年（1382年），马皇后（孝慈皇后）去世，已就藩武昌的朱元璋第六子朱桢，为马皇后做“超度大会”，并在九峰山建筑寺庙，安顿超度大会中所结识的高僧无念禅师。无念禅师在武昌地区弘法，德高望重，相貌福德，行为慈悲，心有块垒者见到他不开口说话，心中不平之气就消散了。

通过多次做佛事，无念禅师深得朱桢信任，于是被推荐给父皇朱元璋，受到召见，在便殿，朱元璋命坐。无念回答问题，令朱元璋满意，想留其在京城古寺里，无念推辞。朱元璋“厚赐，遣中官送还”。无念禅师回武昌时，带回朱元璋御赐寺额“九峰正觉禅寺”和所赐诗文。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朱元璋再请无念到京城相见，并赐诗文和松实。无念禅师81岁时去世，“塔全身于九峰狮子岩之阳”。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武黎嵩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九峰摩崖五首诗文，其中《怀赠无念特赐松实诗》之序，表露出朱元璋“艰于治化”的焦虑，有其自身早年经历的投射，欲借“大觉金仙之道飞”“不教而化，不治而不乱”，达到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目的。九峰山摩崖对武汉地区佛教史，对朱元璋的佛教思想及治世态度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江夏白云洞曾出土唐代石佛，明朝兵部尚书熊廷弼题刻洞名

武汉江夏区八分山南麓的白云洞，唐代即建有石窟寺，立有石佛，明清时期洞内留下多处摩崖石刻，明朝兵部尚书兼辽东经略熊廷弼刻下“白云洞”和“无梁殿”石刻，令白云洞声名远扬。

1. 江夏人熊廷弼赴辽东抵御后金，兵败下狱被杀

白云洞位于白云洞景区内，该处为武昌区的飞地，实则紧邻江夏区城区。相传昔日黄鹤飞离黄鹤楼后，曾在此栖息，并留下“白云黄鹤”之说，故名白云洞。

“白云洞”三字自右向左横书阴刻，楷书字体，看得出来是白颜料填色，红色勾边。左下角有“熊之冏”（熊廷弼，号芝冈，冏为冈的繁体字）三小字落款，以红色颜料填色。

进入洞中，可见石刻“无梁殿”三字，也为熊廷弼所刻。洞口外木牌文字介绍，熊廷弼还曾在此留诗一首：“田家曲径转山阴，忽有神山洞壁深；窈窕龙宫同地脉，崆峒石洞转天心……”

史载，熊廷弼是江夏人，生于明隆庆三年（1569 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考中进士，授保定推官（明朝推官为知府行政助理之一，分掌刑名、计典），后迁升监察御史。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授右副都御史、巡按辽东。熊廷弼赴任后，向朝廷请求在辽东屯田。

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萨尔浒之战后，熊廷弼出任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招集流民，整肃军令，制造兵器，浚壕缮城，巩固守备。天启元年（1621 年），熊廷弼再任辽东经略，因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和致兵败，丢广宁，率军民退守山海关内。消息传来，朝野震惊，熊廷弼坐罪下狱。

天启五年（1625 年），由于魏忠贤陷害，明熹宗下令将熊廷弼处死，杀于西市，传首于九边，时年 57 岁。之后被抄家，累及亲戚、本家都被查抄，其长子熊兆珪自杀身亡。到崇祯二年（1629 年），崇祯帝许其子持头归葬，熊廷弼案得以平反，谥号襄愍，著《熊襄愍公集》。清乾隆启用熊廷弼五世孙，在江夏修贤乡建享堂，在纸坊广坊岭修祠墓。

白云洞内的两处楷书石刻，为熊廷弼何时所刻，目前尚不可考。湖北大学历史学院曾育荣教授告诉笔者，《明史·熊廷弼传》记载，光宗泰昌元年（1620 年）七月，熊廷弼求罢斥，曾“回籍听勘”。天启元年（1621 年）十月，边衅再起，廷议荐用熊廷弼。曾育荣说，江夏白云洞石刻，有可能是熊廷弼在 1620 年“回籍听勘”期间所刻。

2. 唐代石佛在洞内出土时无头，疑被盗

据江夏区博物馆馆长刘治云介绍，白云洞全长约 200 米，是一处贯穿山体的天然溶洞，由南至北，由前洞、无梁殿、中洞、天井、后洞五个部分组成。洞口原有一对武士石雕，为朱元璋驻兵于此攻打武昌后所建，现已不存。洞内现存石佛造像一尊和六

处明清时期摩崖石刻，形成了风格独具的人文景观。

《江夏县志》记载：白云洞又名石洞，唐贞观年间，骆禅大师云游至八分山慈云寺，在八分山下“白云洞”建成一石窟寺，立有佛像一尊，当地成为武汉地区佛教活动中心。

在洞口西壁，可看到“白云洞四通八达，无梁殿万古千秋”两行楷书石刻，白色颜料填色。东壁刻有“两间磅礴，一个峭峒”两行楷书大字，右上方落款“大清光绪三年春”，左侧竖向刻“洞前居士王菊人刊”。工作人员介绍，这两处石刻均由光绪年间隐居在洞内的居士王菊人所题。

前洞后部是无梁殿，殿室借天然溶洞稍加斧凿而成，呈穹窿顶，因没有梁柱得名。殿室高 5 米，殿中立有一尊唐代石像。

石佛造像立于无梁殿中部，带底座高约 3.6 米，是佛教中的阿弥陀佛。佛像双足踏于莲花座上，呈站立状，右臂自然下垂，左臂放于腹前。据资料介绍，该尊佛造像应该是接引佛，盛行于唐代初期和武则天时期。

该尊佛造像为 1982 年修建白云洞内道路工程时发现出土，后经保护立于出土原址。出土时，无佛头、底座，怀疑被盗走。现佛头和莲花座为后人修补。修复时为保护佛身稳定性，两侧用钢筋水泥加固。

中洞是一长形天然通道，长约 40 米，宽约 5 米。穿过中洞，即到天井。在天井西壁，刻有“雷闪洞开”四字，是晚清湘军儒将罗泽南在进攻武昌城时在此屯兵，惊叹大自然之巧夺天工，欣然所题。

罗泽南少年开始研读理学，后协助曾国藩编练湘军，转战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因战功卓著，历迁任知县、同知、道员（加按察使衔）。咸丰六年（1856 年），在进攻武昌之战中，罗泽南中弹伤重而死。

曾育荣教授表示，白云洞石窟历史沿革悠久，是武汉地区仅有的石窟寺文物类型，对研究地区佛教历史有重要意义。

《尚书·禹贡》里提到的“大别”，证实是石刻“大别山”所在的汉阳龟山

武汉文考所提供的资料显示，梅子山摩崖石刻位于汉阳月湖南侧、梅子山北坡。石刻文字“海阔天空”刻于经人工修整的光滑崖面。“灵鹫飞来”石刻，由于山体滑坡，石体脱落，已经湮没。在“海阔天空”石刻东约 50 米处新发现“逍遥”二字石刻。

清嘉庆年间的汉阳诗人萧德宣有诗云：“郎游吴越已多时，妾守空闺误艳姿，灵鹫飞来犹有日，人生相见岂无期。”自注曰：“梅子山悬崖有‘灵鹫飞来’四个大字。”民初著名方志学家王葆心在 1916 年所撰的《续汉口丛谈》记载：“（海阔天空石刻）字各径方三尺余。相距约十余丈，又得摩崖题石更显，字较前题为钜，曰‘灵鹫飞来’凡四大字形体长劲，镌石不甚深，左署不可识。”1926 年 9 月，刘再苏在所著《武汉快览》一书中指出：“灵鹫飞来”为扬州布衣杨威凤所书。武汉当代通徐明庭先生 1988 年 1 月在《春秋》杂志上撰文，引述清道光年间汉川人张清标的笔记，认为“海阔天空”四字为毛会建所书。

大别山摩崖则位于汉阳龟山北坡，字迹刻于一块呈倾斜状较为平整的石壁上，由西至东刻“大别山”三个大字，字宽 1.2—1.4 米，高 1.3 米，字迹表面刷有红漆，大字左侧有小字题跋，题跋小字刻痕浅，风化严重，部分字迹已无法辨认。

“大别山”三字为楷书，每字大约1.5平方米，字体苍劲雄浑，古朴端庄。其左侧还有5行49—52字的边跋，有些字已剥蚀，模糊难辨。全文为：“吾歙方密庵□生补诗古文俱□□尤□□□壁窠大字□剜一时镌□是为江山增色也嘉庆壬申九月同里弟子鲍里星识。”文中可知，这是安徽歙县人方密庵题写，嘉庆十七年（1812年）九月，由鲍里星刻制。

“大别山”名称最早见于古籍《尚书·禹贡》。这部3000多年前的古籍，一共1193字，却两次提及“大别”。其中就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联系文中的前后表述，基本可以界定，这个“大别”就是当时汉阳的龟山。传说当年大禹治水，途经此地，惊呼“一山隔两景，真大别也”，故名。

云雾山观音崖摩崖石刻位于云雾山主峰南侧山腰观音崖上，观音崖因崖壁上刻有观音像而得名，该处地形陡峭，雄浑壮观。石刻位于观音崖一处向外凸出的方形巨石上，高约4米，阔约5米。巨石左右两侧各单线阴刻岩画一幅，左侧为观音像，右侧为佛塔，两幅岩画之间有题记。

左侧岩画为观音形象。观音高髻束发，面含笑意，容貌慈祥；宽衣博带，裙角飞扬，体态丰腴；右手施拈花手印，从容置于胸前，左手端放膝上；观音造像大方隽秀。观音端坐于台上；台座线条流畅，莲瓣宽大肥厚。右侧岩画为“七层宝珠顶佛塔”图案。

两幅岩画之中有题记，自右至左竖行书写，共九列，约一百字，现场勘察中因年代久远，已风化严重，字迹湮没不可辨识，仅能判断有“佛道”等个别字样。

根据佛像风格及题跋记载推测，左侧观音形象和右侧佛塔具有明显元代风格，在两幅岩画之中有题记，题记可能系两次刻凿而成。题记内发现“至正”年号，应刻于元代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六月中旬。

大河冲彼岸摩崖位于新洲区旧街团上村大河冲湾，地处湾口山坡上。石刻内容为“彼岸”二字，刻于自然山体岩石近中部，为阴刻楷书，字体粗狂有力，似颜体，无落款。“彼岸”为佛家偈语，意为“佛教胜地”。“彼岸”石刻相传为清康熙年间得云寺第一代住持林云和尚所书，至今保存完整。

横河崖摩崖石刻位于旧街大雾山村横河西侧崖面上，共“阿弥陀佛”四字，纵向排列。石刻顶部及北部为光滑石面，同刻字石面构成一天然“石室”。

传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新洲大战时到此，坐在马背环视四周山崖十分险峻，勒马回头，口念阿弥陀佛，并御笔亲书阿弥陀佛于崖石上，后人刻之纪念。

武汉文考所工作人员表示，黄陂云雾山观音崖摩崖、新洲大河冲彼岸摩崖和横河崖摩崖，对研究武汉地区历史，特别是佛教史有参考意义。

（万建辉：长江日报主任记者；宋贝、张剑：分别为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助理馆员、文博馆员）

湖北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的来龙去脉

◇ 张慧琴

湖北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是民国时期湖北省教育厅创设的一个重要的教育辅助机构，主要为省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提供科学实验服务，为湖北的学生科学教育与实践发挥过重要作用。

创建缘由

1928 年 5 月，国民政府所属的管理全国教育和学术事宜的机构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由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持，会议讨论研究了教育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教育宗旨、教育行政、教育经费、学制等。湖北省教育厅秘书兼第二科科长陆士寅、武昌中山大学教师陈尧成（后为武汉大学教授）作为湖北教育界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关于科学教育的有《提倡科学教育注重实验并奖励研究案》等多项议案，认为科学关系国家前途，要规定各级学校科学经费标准，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学生实验，养成师资；设立科学博物馆，奖励编纂科学书籍等。特别提出，要“于繁华都市，设一公共场所，备置物理化学生物各种仪器药品标本，供应各校学生科学实验”，使学生所学的课本知识能得以运用。湖北省教育厅创办湖北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正是落实这次会议精神的举措。

创建经过

湖北是教育比较发达的省份，在落实全国教育会议精神方面还算走在前列。省教育厅厅长刘树杞很重视这次教育会议，积极落实会议精神。作为留美的化学工程博士，

他尤其了解科学教育和科学实验的重要性。鉴于各校财力有限、人才缺乏，刘树杞主持教育厅向省政府提出，在武汉筹建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作为各校学生共同的科学实验基地。除基本的科学设备各校可自购外，其他则集中财力，由科学实验馆统一采购，共同使用。

省政府同意建立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决定拨原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旧址（该校1924年改名为省立文科大学，1926年12月并入武昌中山大学，校园闲置）为馆址，以省有学产积存的70000余元作为开办经费，以学产收入（每月3000余元）作为运行经费，不足时由省政府另外拨付。1929年2月，教育厅委派人员开始筹办科学实验馆，同年9月正式建立。

创建之初，省政府先拨6000元，用于增建部分设施，又拨7000元用于定制订购相关器具。1929年上半年，教育厅科学实验馆筹办机构委托上海银行，向美国和日本订购一批仪器、标本和实验药品，共支付35300余元。省立图书馆存有部分仪器、标本和药品（主要是两湖书院——两湖总师范学堂停办后所移交），由教育厅拨给科学实验馆，但其中的仪器大多损坏，需要修复。另外，其他设施设备（如暗室、桌柜台架等）修建、添置亦花费万余元，共计投入48000元，使实验馆建设初具规模。

1930年夏，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正式开馆，经过半年多的实际运行，发现现有设施设备明显不足：一是馆舍不够用，二是实验仪器设备缺乏不少。于是，又由教育厅呈准省政府，决定在1934年前分三期进行建设，以期完备。当时做了一个25万元的预算，一方面请求省政府增加投入，另一方面向中华文化基金会申请补助。

1931年3月，接任教育厅厅长的黄建中携科学实验馆馆长蔡礼成，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资助扶持，获允补助10000元。省政府亦同意补助20000元。由于当年发生严重水灾，省府拨款延后，直到1932年12月才到位，乃委托德国礼和洋行向德国订购仪器药品一批，共支付34250元。至此，科学实验馆实验条件得到一定改善。

由于经费筹集困难，实际上未能完成1931年提出的建设目标。如原来建的温室，很快损坏不能使用，1934年后列入计划重建。自然科学图书所费相对不多，1933年12月起才开始陆续添购。

1934年，科学实验馆又将建设计划进行了调整细化，具体如下：

第一期：

1. 设立科学图书阅览室，购备物理、化学、生物各种重要图书杂志，供给各校教员学生及个人研究之阅览。2. 附设儿童科学博物园。3. 设仪器修理室，置备车床、钻床、刨床和金木工具，以为修理和仿造仪器之用。4. 征集国产化工原料和工业制品，辟室陈列，以资观摩。5. 掘一淡水生物培养池养一部分淡水生物，以供实验材料。6. 建成保护热带植物的温室，俾寒假期有新鲜植物，可供实验。 7. 绘制各种动植物之解剖生理及组织挂图，使学生按图寻索，可省教师演牌指示之烦。

第二期：

1. 安装发电机，附配电板，并利用汽油发动机发动，以供给全馆电灯及各部实验之用。2. 装置电池高压组和高压直流发电机，成立无线电研究室。3. 安设自来水及煤气装置，以供实验之用。4. 添置各部特殊仪器及药品，以为研究应用之需。5. 收集国内外稀有之动植物标本，使行将灭绝之种类，得以

永久保存，以供精深研究者之考证。6. 分设临海及临湖实验场所，采获多量水生物，使研究者不致偏蔽于一隅，或为大陆局部所限。

第三期：

1. 成立国产研究处，以研究土产之利用及其应改良之点。2. 设立化验室，以供农商工矿各界物品之检验。3. 备置天文应用之各种模型仪器，为天文台之初步设备。4. 设立气象及地磁观测所，俾与中央机关想联络，以辅助其所不及。5. 扩充生物学技术室及研究室，并添置各种专门仪器药品，以便实地制造动植物外部形态与内部组织之各种腊叶（指干制标本）剥制浸渍模型等标本，及生理生殖或微生物与病理学薄片标本，以供给各地之需要。

另外，附设儿童科学博物园，以供小学生接近自然、观察自然，启发儿童研究自然之兴趣，培养科学教育的初步根基。

以上计划的第一期虽然延期了，但在1934 年基本实现。其二、三期由于经费难以保障等因，未能全部完成。

机构设置

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由馆长领导的馆务会议负责管理、运行，下设物理部、化学部、生物部、总务部及图书选购委员会、刊物编辑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等。

原有建筑中的前厅（平房）为馆长办公室和总务部工作室，3 栋两层的楼房，分作物理、化学、生物三部实验楼，每部一栋。前栋为生物部，一楼设两个实验室、一个动物标本室、一个植物标本室；楼上设有关于动物和植物的陈列研究室等。中间一栋为物理部，一楼设两个实验室，一为天枰室、一为电学实验室，还有两个暗室；楼上则设力学仪器室、音热学仪器室、光学仪器室、电磁学仪器室、研究室图书阅览室以及器械修理室等。后一栋为化学部，一楼设两个大实验室，预留天枰室、仪器室、药品室、蒸馏室等，二楼设 3 个仪器室、1 个药品室以及研究室、图书阅览室等。后厅为纪念室。其他厢房或辅助用房辟为图书阅览室、儿童科学博物园等。

每个实验室可容纳 50 人做实验，即能满足一个班的学生同时参与实验。

职员选配

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的职员，大都遴选的是学有所成的知识精英。

首任馆长为黄冈籍的蔡礼成，1928 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攻数学)。回国后，先在武汉女子中学任教。1929 年 9 月，被教育厅选聘为公共科学实验馆馆长。1933 年 10 月离职。其间，因馆内贵重仪器被盗，曾一度入狱。该案初发时，因内部斗争，他被人指责“监守自盗”，后发现实系一湖南籍职员盗走，乃被免罪。

物理指导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尹元勋。尹是黄安（今红安）人，1930 年调省教育厅任科长，1933 年 11 月兼任馆长。

继任的物理指导员李壎（安陆人），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他还兼任经费审查委员会主席委员。

化学指导员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潘龙霖（麻城人），1930 年 6 月离职。

继任的化学指导员是北平大学工学院毕业的唐崇礼（蒲圻——今赤壁人），他还兼任刊物编辑委员会主席委员。

生物指导员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毕业的廖作霖，他还兼任图书购置委员

会主席委员。廖是鄂城（今鄂州）华容人，1929年9月到馆任职。他是该馆资深指导员，解放初调任湖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以上三部除设一名指导员外，还设有指导兼助理员或助理员一名，任职者也都是名校毕业，学有专攻。

实验安排

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主要是为省立高中以上学校提供学生科学实验服务。每学期开学前，各学校将来实验的班级数量和实验科目、时间等报送科学实验馆，由科学实验馆与各学校共同商定后制成总表，然后分送各学校，按表施行。

到科学实验馆实验的学校，有省立10余所学校：女子职业学校、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武昌中学、武昌第二女子中学、武昌乡村师范学校、武昌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武昌师范学校、高级中学校、第一女子中学校、农业专科学校（抗战时改为湖北省农学院）、职业学校等。抗战时，私立的武昌中华大学附设高中部，也商请该校高中三年级到馆做实验。

各校参加实验学生到馆后，每班按人数多少适当分组，一般为2—4人一组。因仪器有限，不能同时进行，只能分组轮流进行。实验时，由各校教员和实验馆指导员共同指导。每次实验时间一般在2小时以上。实验仪器、药品，均由指导员、助理员在实验前准备，在实验后清理。有因请假未随班级参加实验而需补做者、部分初中学生实验演示、个人研究等，由馆方根据馆中实际情况临时安排。

科学实验馆不仅能为各学校学生提供实验场所，配有专业人员予以指导，并且各校师生参加实验者在一起，还可以相互观摩，相互促进。

各校学生实验情况，还有专门的表格填写，由各科教员评定，汇交科学实验馆呈省教育厅备查。

另外，儿童科学博物园建成后，也接收小学学生参观和简单的实验。

1933年，教育部督学钟道赞在《视察湖北教育总报告》中称：“各校实习场所，每因设备不周，敷衍从事。”科学实验馆建成和条件逐步改善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该馆开放后，到馆实验学生逐年增加，至1931年3月时，每周到馆实验的有高中50多个班次、约1550人，最多时每周达2000余人，少数个人研究者和初中学生不在其内。私立中学也要求参加实验的，但接待能力不足等因，未能满足。

抗战时期，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当时馆长为萧济时）像省城许多机构一样迁往恩施，继续为恩施及周边地区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提供科学实验服务。抗战胜利后，该馆又迁回武汉（馆址改设武昌水陆街），因时局动荡，一直处于维持状态。

解放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收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改为湖北省人民科学馆。1953年3月，省人民政府决定撤销该馆，并以该馆为基础成立湖北省博物馆（筹备处）。

（张慧琴：湖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本刊2021年总目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卷首语

风华正茂百年史 赓续血脉启新程
杨　智（5/6.1）

初心篇

五四运动中的恽代英　田子渝（5/6.4）
董必武：从同盟会员到中共党员
邓正兵　谢　忱　刘佳欣（5/6.10）
党的创立时期武汉地区党员考证
孙　勐（5/6.14）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自身建设概况
刘桂芳（5/6.26）
暗夜播火——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后
宋　健（5/6.31）
周恩来在武汉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
吴文俊（5/6.33）

担当篇

“一五”时期武汉工业化建设及其成就
许　歌　肖　捷　杜宏英（5/6.37）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市农业农村改革开放的回忆　杜远威（5/6.42）
难忘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龙王庙
吴世纬（5/6.49）
东风汽车和武汉的不解情缘
谢　勤（5/6.54）
一路风雨一路行——见证武汉城市转型
袁善腊（口述）　周　敏（整理）（5/6.59）
武汉长飞光纤光缆项目建设回顾
杨能森（5/6.67）
我们走在脱贫攻坚路上　谭本忠（5/6.71）
武汉有座习总书记批示建立的纪念馆
赵晓琳（5/6.76）

不负习总书记深情厚望，为居民守好社区这个家
陶久娣（5/6.80）

团结篇

回忆1984年武汉创设“双月座谈会”制度始末
王功安（口述） 范前锋（整理）（5/6.84）
我与世纪之交的政协工作
刘善璧（口述） 游 迎（整理）（5/6.88）
群星朝北斗——我与名人后裔交往的故事
李传德（5/6.94）
落实宗教房产政策二三事 马奇明（5/6.99）
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做好界别工作的回忆
朱大成（5/6.102）
我做统战工作的10年回忆
杨 光（5/6.106）
在榜样的引导下努力履职尽责
刘珍秀（5/6.110）

后记

做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本刊编辑部（5/6.115）

红色印记

镌刻红色记忆 开启新的征程——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扩馆改陈纪实 张 晶（1.4）
定格历史记忆的红色摄影师——童小鹏与武汉八办的照片之缘 王 莹（2.4）
三块怀表的记忆 章 兰（3.4）
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筹建亲历记
赵晓琳（4.4）
八七会议代表任弼时及其背后的故事
汪孟旋（7.4）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建设亲历记
高万娥（8.4）
战火纷飞中的点点记忆——王应絮回忆在八办工作的日子 杨 轩（9.4）
百年风云话名舰——中山舰 祁金刚（10.4）
红色堡垒——姚家山新四军第五师机关驻地
赵天鹭（11.4）
中共五大基本陈列改陈提升亲历记
万 玲（12.4）

文化传承

国漆精制技艺：跨越7000年历史长河的民族技艺
朱福田（口述） 余继先（整理）（1.11）
我的70年剪纸之路
刘士标（口述） 赵亚琪（整理）（2.7）
执心著“木” 雕刻人生——武汉木雕传承人邓道航口述实录
邓道航（口述） 马翠翠 刘 恋（整理）（3.7）
一甲子守护民间艺术的非遗传人
朱汉生（口述） 胡 蝶（整理）（4.12）
灯彩、剪纸、圆木微缩技艺传承人刘国瑞
刘 旻（口述） 雷 迅（整理）（7.8）
追梦古砚得高趣 雕琢石君谱新篇
吴和平（8.11）
光阴的故事
任本荣（口述） 王炜佳（整理）（8.9）
汉派石雕的前世今生 安 力（10.9）
我的父亲和他的善书人生
袁中秋（口述） 宋 艳（整理）（11.9）
尘封档案再现拉戏的百年流变
顾丽敏（12.8）

商聚汉皋

脚踏实地慢慢走
陈定开（口述） 邓 菁（整理）（1.17）
即时诊疗 创新无限
陈莉莉（口述） 高爱民（整理）（1.22）
时代浪尖的弄潮儿 胡华锋（2.12）

化作春泥更护花　马红军（2.16）
行者无疆初心在　俞　卫（3.11）
我和吉安商会的那些事　巫世峰（3.15）
勇立潮头方显创业担当
林文豹（口述）　郭国松（整理）（4.16）
知难不畏难 勇于创事业
吴　刚（口述）　金高良（整理）（4.20）
不忘初心，感恩善为
喻　鹏（口述）　陈　剑（整理）（7.12）
二十五载，绽放在激光界的巾帼风采
付　俊（7.16）
全力，为健康
陈光明（口述）　张川蕾（整理）（8.16）
深耕主业，树立建筑安装行业金字招牌
徐卫忠（8.20）
江右商帮 行者无疆
张国勤（口述）周　婵（整理）（9.12）
我的创业经历
陈柔先（口述）杨贵萍（整理）（9.16）
大道至简“智”造路
朱明礼（口述）　许　濛（整理）（10.16）
归来少年 初心不改　金献新（10.21）
我的“长征”
王木甫（口述）　严　濂（整理）（11.14）
转型年代的创业奋进
吴华林（口述）　李　星（整理）（11.21）
有种力量叫“湖北浙商”
何明东（口述）　许　濛（整理）（12.11）
“三硬商人”的桑梓情
李万军（口述）　严　濂（整理）（12.16）

精工匠心

平凡中的不平凡　吴　刚（1.26）
当好武汉地铁“最强站长”
姚　婕（口述）　白爱萍（整理）（2.20）
毫发技艺 顶上功夫
岳汉桥（口述）　白爱萍（整理）（3.19）
我是通信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潘圣宇（口述）　白爱萍（整理）（4.24）
与钢筋水泥相伴的精彩人生
黄　昕（口述）　白爱萍　李晓佳（整理）（7.21）
倾心邮路
徐　龙（口述）　白爱萍（整理）（8.24）
我是一个“抹布”书记
胡明荣（口述）　白爱萍（整理）（9.19）
从农民工到技改专家
罗善善（口述）　白爱萍（整理）（10.27）
为生者权为死者言
韩　煦（口述）　白爱萍（整理）（11.25）
我是“玩泥巴”的勘察人
徐　凡（口述）　白爱萍（整理）（12.21）

委员天地

在正义之路上下求索　吕　琳（1.32）
我当界别召集人经历的几件事
付文芳（1.36）
为初心 做匠人　徐击水（2.25）
我的抗疫故事　邝远平（2.31）
华中国际车展按下武汉会展的重启键
张　珺（3.33）
我的教育之路　张际爱（3.36）
援疆工作的片段回忆　周凤华（4.36）
我的委员作业　汤维钧（4.40）
尽心履职 描绘青山北湖发展宏图
乐敏霞（7.25）
我当政协委员这几年　晏　鸣（7.28）
一名来自律师界老政协委员的体会
刘昌国（8.28）
提案线索就在你身边　陈荣华（8.31）
一名会计师的思想成长之路　梅佑轩（9.35）

亲历童家湖“阻击战” 魏云乔（9.41）
我与新疆学生结下的“石榴情缘”
李春生（口述） 郭丹丹（整理）（10.31）
为武汉文化软实力建设添砖加瓦
杨 华（10.35）
心中有梦，做公平正义的践行者
张 霞（口述） 唐红漫（整理）（11.29）
在光影与建筑中寻找城市的无限可能
蔡新元（口述） 郭佩珊（整理）（11.33）
厚植为民情怀，牢记医者本心
侯立新（口述） 郑雅飞（整理）（12.25）
一位老台盟人的对台工作感悟
吴 晖（口述） 唐红漫（整理）（12.29）

往事漫忆

怀念我们的父亲谭维四
谭白英 谭白明（1.40）
用血肉之躯为人民群众筑起铜墙铁壁
赵 闯（1.45）
我在水生所做研究 刘仁俊（2.35）
从事科技情报工作的片断回忆
吴至诚（2.38）
我和我的钢琴博物馆 贺立军（2.42）
回眸建国初期的武汉二中 巴忠人（3.40）
我的学徒生涯 肖人杰（3.44）
《光明日报》湖北记者站建站亲历记
肖志华（4.43）
民族一家亲 温暖学子心——东湖中学代理家长志愿服务活动回顾
杨万军（口述） 刘中燕（整理）（4.48）
宽厚的长者 卓越的领导——回忆王群同志
叶金生（7.32）
木兰生态旅游区的诞生 计 蕾（7.36）
父母亲对光未然的回忆 曾宪德（7.41）
往昔数十年求学与任教的追思
刘宋川（8.35）
大集学校的那些人和事 周 敏（8.42）
武汉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三级跳”
杨普社 熊恒多 张 凯（9.44）
怀念谭维四先生 冯光生（9.49）
十年沧桑话巨变 珞珈山下水生烟
欧阳海龙（9.53）
阳夏战争后的汉口一家人 曾宪德（10.45）
百湖一城半生缘 探得武汉“湖泊图”
陈红梅（11.37）
湖北联中校友万庚育的敦煌情
王 立（12.33）
武汉长江二桥工地采访手记
尹新秋（12.39）

山有黉门

回忆创建华中数控的岁月 杨克冲（3.23）
20 世纪 80 年代在珞珈山看电影、听讲座
陈东华（3.28）
在珞珈山读书的日子 周 玲（4.28）
华中工学院机械厂孵化记
周爱民（口述） 苏明华（整理）（4.32）
在珞珈山幸会大师 陈东华（9.24）
歌从天上来——忆韩勋国教授
周希正（9.28）
珞珈山七年求学记 邓咏秋（10.41）

都市史话

回望武汉治政史上名芳千古者
郑巍宁（2.45）
武昌后长街往事 陈德刚（2.49）
汉阳古城旧事 胡德彰（2.56）

江城古桥面面观　李庆南（3.55）
老照片中的汉口英租界岗亭考析　胡全志（4.53）
义品里及其周边历史建筑　王汗吾（4.61）
百子巷，岁月如稠情如故　王琼辉（7.52）
汉口总商会大楼百年风云　殷　莎（11.57）
湖北省立图书馆西迁记　彭余焕（11.61）
湖北省立公共科学实验馆的来龙去脉　张慧琴（12.56）

史海钩沉

武汉解放初期的《长江日报》及其对中南舆情的影响　唐惠虎（1.49）
《长江日报》对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个春节的报道　朱建华（7.48）
户部巷食话　曾庆伟（8.55）
西商跑马场的那些老建筑　万桂春（10.57）
清末湖北新型知识分子与辛亥武昌首义　张笃勤（11.44）
罗马尼亚话剧《失去的信》在汉排演一波三折　庄桂成　赵亚琪（11.50）
“新升隆”轮事件中遇难的五位湖北籍烈士　王文宾（12.43）

人物春秋

爱国学者徐行可与教坛名师刘凤章　刘松余（3.50）
红色伉俪从鄂豫边烽烟走来　罗建华（8.50）
辛亥名人胡兰亭和他湖北联中的孙儿胡佑华　王　立（9.58）
辛亥革命先贤朱祖圻父子和蓝天蔚兄弟　卢　俊（口述）　卢　纲（整理）（10.50）
张金保：纺织女工主持党的五大闭幕式　陈礼才（11.54）

文史随笔

一则张之洞传说的诗学解读　刘守华（1.56）
穿透浓雾向阳开　李宗祥（2.60）

楚风汉韵

仁者琴痴 天上人间——一代琵琶大家陈钧先生二三事　罗　复（1.59）
江夏龙泉山名人印记　涂明星（3.60）
黄鹤楼轶闻　夏新民（7.59）
文联大院漫记　张明建（8.60）
渗透着世事沧桑的戏台楹联　李笙清（10.61）
摩崖石刻见证武汉古代厚重历史　万建辉　宋　贝　张　剑（12.47）

目录索引

本刊2021年总目录　（12.60）